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10 年 11、12 月合刊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
- 6、浏览最新信息可登陆豆瓣“独立阅读”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ledu/>，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孙骁骥、扬克、灵子

轮值编辑：言一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贾葭（北京）、罗四鸽（上海）、扬克（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燕舞（北京）、灵子（北京）、吴强（北京）

翻译：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编者按：

11月13日，昂山素姬在被幽禁15年之后终于获释，消息本身固然足以鼓舞人心，但却无法因此带来对于缅甸政局的乐观。同样的逻辑亦可用在胶州路鲜花之上。一场大火是否足以照亮（illuminate）民智，烧出一个市民社会或是（查特杰所谓的）政治社会，恐怕还是未知。

寒冬初至，当添衣御寒。只是物价飞涨兼调控无力，就算瑞雪普降，丰年亦显得有些可望而不可及。唯有安坐，捧茶而读，于忧心之中求暖心。

来函：

豆瓣网友 阿杜：

2010年10月“独立阅读”的诺奖专题及朱白先生的两篇文章，个人很喜欢。

一处貌似笔误：第3页阅读报告·经济专栏，苏小和先生一文，第四段第二行最后一句，“面度美国叙事”，“面度”二字疑误，应为“面对”？

豆瓣网友 nejma：

2010年10月“独立阅读”里提到的台版《僧侣与哲学家》，译者是赖声川本人，而非他太太。

“独立阅读”感谢两位网友的指正。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孙传钊：枕头边的书
刘 柠：那些愤怒的年轻人

书评

孙传钊：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三）
朱 白：这一次，论尽我的一切
凌 越：汗淋淋走过这些词
吴 强：迟到的《帝国》评论
刘 柠：都是“人民”惹的祸
贾 葭：伊利札洛夫同志归国记

影像

夏佑至：诗人总会返乡
言 一：Following Nolan

译介

马克·里拉：北京的施特劳斯旋风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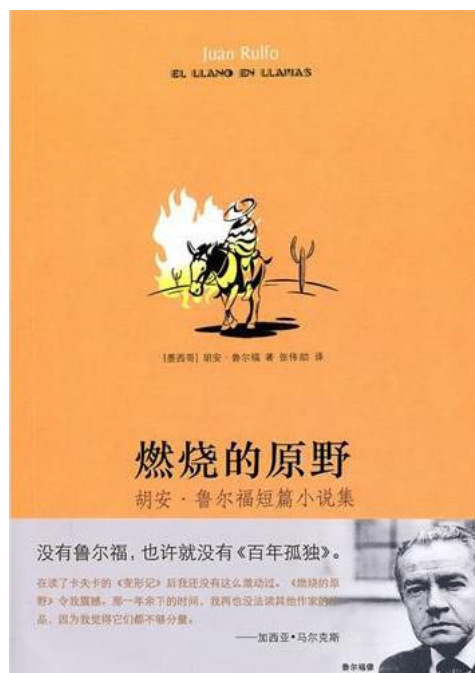
LITERATURE · FICTION 写作·虚构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youjinma@gmail.com)

《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正在逐一揭开面纱, 尽管这已经成为了一年里老百姓最惦记的娱乐大戏, 但还跟以往一样, 每当他们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便会遭来各种意想之中的褒贬。重要的是, 褒, 变得越来越可疑, 贬变得越来越没有道理。这能说明我们的怀疑精神越发膨胀, 也能说明我们的文艺作品质量永远赶不上老百姓的审美需要。跟争夺传说中的“100 亿”的票房市场比起来, 作家也在争, 版税、版权, 这一波也吵得热闹, 只不过我们这个文字大国里的作家即便吵架也显得有点孱弱, 缺少大牌、出个郭敬明都能让人尖叫的这里, 作家更像是讨饭的, 不仅仅跟读者讨, 更是跟出版商、盗版商讨。

也许不需要这么喧嚣, 大家继续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 让口水、炮弹那些浮云远离一点创作者比较合适。菲利普·罗斯 30 年前出版的《乳房》(姜向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如今在国内出版, 除了他一如既往地关注大学教授的情欲以外, 我们还能发现, 这位美国作家尽管名扬天下屡获传说中的诺贝尔提名, 但其实他的变化并不大。《乳房》算不上菲利普·罗斯的代表作品, 但主题和题材跟他仍然是他一直关注的一一大学教授的欲望与爱。若干年前卡夫卡让忧郁的人变成甲虫, 罗斯则让他的主人公变成乳房, 当然这个意向直指的是欲望。大学教授非常特殊, 高高在上, 吸引那些有可能对他(或者是他所掌握的问题)向往和爱慕的学生, 师生恋在所难免。这个主题我看过最好的是《耻》, 面对如此高峰《乳房》的意思就更该减分了。其实不是, 这部作品是罗斯 1980 年出版的, 《耻》差不多要晚 20 年。

短篇小说一直是我愿意关注的, 经常是看到新的或者有百分之一可能好看的, 就会收入。《化圆为方: 俄罗斯当代获奖小说集》(卢基扬诺夫等著, 刘宪平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是俄罗斯当代年轻作家作品选, 关注下邻国的 70 后、80 后说不上多重要, 但我觉得挺有趣的。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巨大, 对于曾经的一代作家来说, 不仅仅是从苏联文学身上吸收营养, 还有模仿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 这些对于文学来说都很正常, 但遗憾的是, 迄今我们不但没有托尔斯泰、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连《骑兵团》、《金蔷薇》那样的作品也没有。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了俄罗斯新生代的作家, 是俄罗斯著名文学奖“处女作奖”的代表作品。这些新锐作家带着新新人类的气息和摆脱了前人的影响之后, 呈现给我们是怎样的感受呢?



说起短篇小说, 胡安·鲁尔福这位只有一本书那么厚的作品却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大师的拉美作家, 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早就是心中的神了, 但现实是他的知名度并不足够, 至少比博尔赫斯差了太多。他毕生作品只有不厚的一本书, 包含一部长篇、若干短篇不足 30 万字。上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的中文版单册全集, 如今在网上已经被炒到一百元。这部曾名为“烈火平原”的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张伟劼译, 译林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内含 17 篇短篇小说, 气质完美、身材极致、五官更是可以成为教科书。《燃烧的原野》是重新翻译,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自然要超过前人, 翻译上更加细腻逼真, 但可能是先入为主, 我总是觉得此前屠孟超译的那种粗糙和生涩更属于鲁尔福一点。

新作品常常见, 但大师却非年年有。大师的未出版的作品能见到, 就可以被称之为乐事了。福楼拜的《庸见词典》(施康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的出版不仅仅是补缺的, 更应该成为洞悉一个时代的秘密之书。如果 19 世纪的法国人福楼拜只能点破他所处的时代, 那他只能是巨匠, 作为伟大的

作家，他必须要有超越的眼光，以至于将自己的言论放在下一个时代也仍然生效。《庸见词典》当然就是这样的作品，里面的温柔善意的讽刺和恶狠狠的嘲讽，你看了就难免对号入座，因为他也一样可以让我们在里面轻易就找到自己的影子。人世间的荒诞太多了，比如高雅的做派，本身不是坏事，但当一个玲珑并不高雅的人非要展示他的高雅时，你就知道这荒诞的重量其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体现了。

刚刚说了两位大师，但其实“大师”这词近些年口碑并不是很好，它已经流落为一种讨好的、尊敬的、礼貌的，当然是也是一种媚俗的称呼，不掐指地算一算，我们国内，至少已经有超过 1000 个作家、不少于 500 个导演都被称之过“大师”。真正的大师不是被人当面叫出来的，比如杜尚，这个艺术家中的艺术家，即便什么都不干，或者玩玩国际象棋，也有人愿意顶礼膜拜并送上时代的艺术大师称号。杜尚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上一个时代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仅凭不过时这一点，他就是卓越的。我们对杜尚这个级别的艺术家的，充满熟悉的陌生感，一方面他的符号性作品（比如小便池）、形象乃至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很少真的有机会走进他们的作品。对作品的陌生导致对人的疏离是难免的。《杜尚传》（朱迪特·伍泽著，袁俊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1 月）这部近 50 万字的传记当然不能满足介绍生平，更是集中挖掘了关于杜尚的几个谜团，让我们一次性地见识他艺术家的真实生活，这非常必要。

杜尚身上充满了引领和影响作用，对同时代的和后代的精神作用，直到今天也不难看到。在这部《杜尚传》的“爱神，这就是生活”章节里，作者这样写道：“他本想起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为自己加上一点宗教色彩，但男扮女装似乎比改一个带宗教色彩的名字更有震撼力。”于是，那个涂抹着烈焰红唇围着貂皮围巾翘起兰花指的女人“罗丝·塞拉维”，便成为艺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变性人”作品。上世纪 20 年代，你可以说杜尚为了个性不折手段，但你也也许会承认，他可真是走在时代之前的明白人。

《盛开的樱花林下》（坂口安吾著，袁斌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 10 月）是我最近睡前要看上两眼的作品，不是用来催眠，而是他的那些怪异故事适合作为梦的一个引桥，让即将的梦境适时展开。从太宰治那里听说“无赖派”，然后再从“无赖派”那里知道坂口安吾，日本文学无需吹嘘，她确实是一座矿产丰富而璀璨的宝藏。坂口老师出道于二十几岁，编杂志、写评论，成名在不惑之年，仍然是先立观点后出手证明其观点的小说作品。在这部小说集中，开篇的《盛开的樱花林下》偏古典美，有点《聊斋》中与女鬼风流的意思。其“无赖”思想在容纳了若干篇可以单独成篇的短篇《我的人生观》中集中体现了。坂口安吾的颓废有着一一种无伤大雅并无伤害性的残忍，在这种看似残忍的基础上，主人公通常是输家，不是时代原因，而是自身的“精神需要”，甚至这种残忍看多也能成为一种优雅。日本曾经为太宰治、坂口安吾等作家的代表作拍摄过动画片，包括这篇《盛开的樱花林下》，还有《人间失格》的等作品的动画短片被命名以“青文学”系列问世（视频网站都能看到），片中开头还有主持人送上的日本当代文学及作品的讲解。想一想，即便这种文艺作品身后的“附属品”也让人羡慕啊，不用对比，你也知道中日两国的差距是怎么呈现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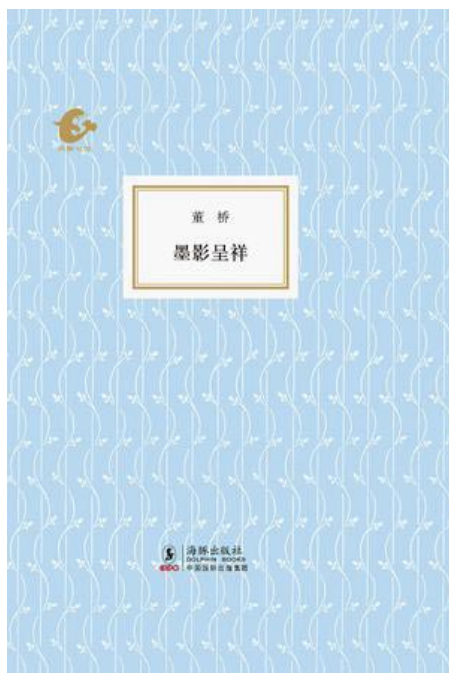


LITERATURE · NONFICTION 写作 · 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石家庄，zhm7976@126.com）

偶然在书店购得两册精装《万象》杂志的合订本，连夜阅览，真觉得赏心悦目，目不暇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万象》杂志我时常购买，书架上早已经摆放了十分可观的一大排，但总是有些不齐整，这

次买回合订本来读，依然是满心欢喜，觉得似曾相识，又芳香依旧。美好的文章总是让人恋恋不舍，现在尽管我已经连年订阅了这本小刊物，但却觉得有些今不如惜的感觉了。且说这两册 2005 年的合订本，便有舒芜、黄裳、余英时、张大春、陆谷孙、辛丰年、李欧梵、夏志清、童元方、叶兆言、胡文辉、傅月庵、严峰、止庵、张宗子、苏友贞、唐诺、舒国治、陈冠中、毛尖等文字好手时常露面，且还有董桥的专栏“书房的夜景”、范旭伦的专栏“容安馆品藻录”、林行止的“闲读闲笔”、小白的“西厢记”、迈克的“超重行李”等，皆是十分好看。《万象》杂志此前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以及上海的出版名人陆灏联手打造的，如今的《万象》杂志已经有些物是人非了，陆灏致力于《上海书评》，而其中的关键人物俞晓群也已经离开这家曾创造人文出版奇迹的出版社。这些似乎都是一堆有趣的闲话，不过近来偶然购得董桥的一册随笔文集《墨影呈祥》（海豚出版社，2010 年 8 月 1 版），才发现原来这册文人集子之所以由这家似乎出版儿童读物的出版社出版，正是因为俞晓群先生的主政，才使得这一脉文气得以延续：收入这套“海豚书馆”的丛书由沈昌文和陆灏策划，分为橙、蓝、红、灰、绿、紫等六个系列，其中文学原创由孙甘露主编，海外文学由董桥主编，文艺拾遗由陈子善主编，学术原创由葛兆光主编，学术沟沉由傅杰主编，翻译小品则由陆谷孙和朱绩崧主编；仅看这格局，便可谓一时佳选，巍巍可观啊。



我原本对于香港董桥先生的文章是有些不屑于读的，但近来却着魔似的迷恋，由江迅所选编的《董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年 6 月 1 版）是自己近一段日子里常常温习的一册著述，而海豚出版社的这册《墨影呈祥》则也是十分喜爱。之前总觉得董桥造作甚至雕琢，又觉得过于雅致和风月，总觉得有些远离烟火和人间的感觉，未太多读便也就有了厌烦之情。但后来慢慢重读便也觉得新鲜，不似其他散文和随笔作家的文字，只需要一遍，即使再好也绝对不会重新翻阅的，我想这便是董桥下笔谨慎、运笔精细以及雕琢的结果吧，便也是可以常读常新的原因所在。记得学者缪钺先生曾经比较诗与散文，便有过这样精辟的议论：“诗应当是不同于散文论著的。好诗固然要有进步的思想，健康的感情，但是还必须具有高妙的艺术，创造优美的意境、风格，具有魅力，吸引读者，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发兴起。诗可以比作酒，能使人陶醉，也可以比作花，能使人迷恋。读诗者也正如饮美酒、赏名花，要涵咏其风味，而不仅是了解其内容。一篇散文，读过之后，内容已知，就不愿再读（有高度艺术性的散文除外），但是对于好诗，甚至于一首短短的绝句诗，可以多年玩味，百读不厌。”

（《杜牧诗简论》，载《古典文学论丛》第 66 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 7 月 1 版）董桥的散文之所以可以重读，便正是缪钺先生所排除的那种高度艺术性的散文，如诗歌一样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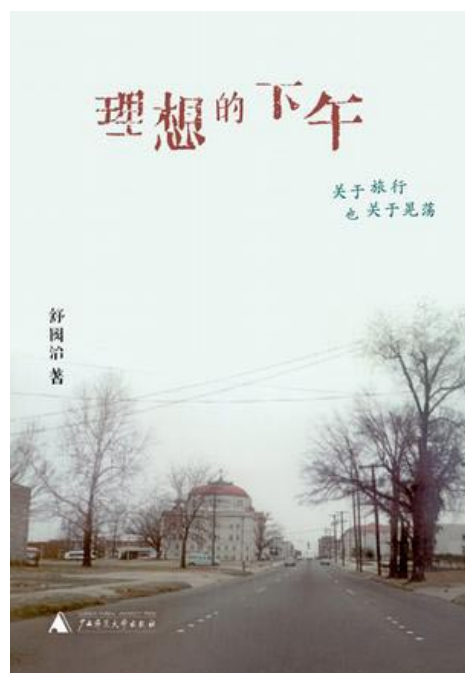
但问题也不简单如此，董桥的散文也不仅仅如大陆出版的这册如《墨影呈祥》这样充满闲趣的文人雅集，那仅仅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我近来在网上也是偶然读到董桥在香港的《苹果日报》连载的专栏文字，读他对于时事的分析，对于政治的议论，对于历史的感怀，却也是同样的有骨有肉，气血淋漓，完全区别于之前我所印象那位远离社会和退缩到书斋与文玩世界里的文人形象。而这时，我才发现之前我所读到的董桥文章，许多暗含的思想火焰只是并非气焰嚣张罢了。我向来以为文人做文章不但文辞要独特典雅，布局要精心大气，还要有情趣，更重要的是脑子要清楚，不糊涂、不冬烘、不僵化、不偏激才可以，我终于可以为董桥松口气了。听说广西师范大学准备推出一系列的“董桥作品集”，我在这里为朋友们做个广告，但也并不报太大的希望，因为可以预计的是，那些对于政治、历史以及社会时事的议论，依然是可以被彻底删汰掉的。

或许是因为自己文字功底薄弱，我异常地关注当下文章高手们的文字。而逐渐读下来，也才发现许多海外和台湾的作家笔下的文字十分了得，而国内不多的文字好手们，其视野也多是直接与五四一代的文化传统连接了起来，想来想去，或许是中文这样的美好东西，近百年来已经被我们糟蹋的不成样子了，我

们必须得返回去，走一条重新探索的路子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或许还有差点被自己错过的台湾作家舒国治的两本散文集《理想的下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1版）和《流浪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版）。广州的戴新伟兄说舒国治的文字有一种“萧简之美”，这其实是一种有趣的美学的概括，而我在读舒国治的散文集时，不但为他在文字之中所流露出的意境所感动，而且感动他在文字使用时的干净、干脆和自然，有行云流水，又有果断决绝，还有一种古风，又有一种西趣，这种又古又新的风格让我想到了备受争议的木心先生，而一开始，我读木心也是有些不自然，但越来越觉得其文字的张力与美妙，汉语的高妙尽在其中，让我愈读愈喜。为此，我想到北京的孙郁先生的一段颇有意味的剖析：“我读五十余年的国人文章，印象是文气越来越衰。上难接先秦气象，旁不及域外流韵，下难启新生之路。虽中间不乏苦苦探路者，但在语体的拓展和境界的洒脱上，还难有人抵得上木心。他对我们的好玩处是，把表达的空间拓展了。”（《木心之旅》，载《读木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1版）

我不敢轻言自己对于美文的理解，尽管自己只是悄悄地读自己喜爱的文字，如果能够从其中摸索出一二点的门道，那也算是自己的造化了，不过我倒是很想将自己读过的好文章与大家分享分享的，也很想将那些文字写得高妙的作家们介绍给朋友们的，因此，我不妨列出几个以写作随笔小品取胜的当代作家的名单，与大家交流和切磋，如果你觉得不值得一读的人物，一笑而过则可了，列位有兴趣不妨来读以下几位的文章：黄裳、木心、董桥、谷林、缪哲、冯象、止庵、陈丹青、胡河清，等等，以我有限的视野所见，这几人的文章大多皆可一读的。当代汉语文章运用得神妙的高手，如木心、杨绛、董桥、缪哲（包括他的全部翻译文字）、止庵、陈丹青、龙应台、章诒和、扬之水、高尔泰、朱天文等多人，我皆有过文字介绍，惟独批评家胡河清我未在读书报告中提及。五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胡河清的批评文字，立刻便被那些奇妙而清秀的评论文字所折服。在我以为，这些优美的文字之所以还能够吸引我，正是因为评论家是以与作家同等生命的精神体验来对待的，那每一行的文字都凝结着一个评论家内心的魂魄。一个没有生活的人，不可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样，一个缺乏生命体验的评论家，他笔下的文字是同样空洞与干枯的，因为生命的相同感受，甚至是超越创作时的生命体验，评论者才能写出我们生存真相的文字来。胡河清的文字让我懂得评论是一种新的创造，也是平等的生命对话，更是同样充满着生命爱意与温暖情绪的思考。与胡兰成相比，胡河清是一个绝对的隐士，寂寞、清秀、遗世独立，生活在文学这一领域而绝不向外扩张。胡河清的评论让我的写作为之一变，但却始终难以望其项背。不过，我最终从这位评论家中发现了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学评论家的内在秘密。至今我还一直将他的文集《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火凤凰文库”之一，1994年12月1版）作为自己时常温习与参照的文本。由胡河清，我觉得作为一个评论家，他需要与创作者相同的甚至更高的要求，因为没有来自生命的磨砺，如何去体悟另外一个灵魂的独语，又如何能够体察到那些不为人知的幽微之处？

止庵先生我曾有过交往，他曾对我的文字有过指导之恩，特别是对我的文章中粗糙芜杂之处多有指教，但我对其的推举也并非这样浅薄的功利。尽管止庵曾告诉我他既不喜欢董桥的文章，也不欣赏黄裳和孙犁等人的散文，但也毫不影响我在此一起推介他们的文字，因为我觉得之所以这样风格异样的文字，才让我看到了汉语的魅力无穷之所在，而我也尊重每一种探索与趣味。记得在止庵关于自己笔名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我想象中读书的所在只是一处‘庵’——荒凉里那么一个小草棚子而已。”这倒是让我想起知堂的读书趣味来，而止庵所欣赏并取法的也恰是知堂与废名的文章境界，他向来对于张牙舞爪甚至是剑拔弩张的文章比较厌恶，而向往枯瘦平淡的境界，这本是个人喜好与气质所定，但文章读的多，最终发现还是那些扎实平淡的文章值得反复来读。止庵先生的《河东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1版）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之中，所选文章皆为学者生命脉络中的重要篇



章，我读止庵的此著，发现他的与众不同在于，早年写诗歌也写小说，而后却多写读书随笔文章，小说诗歌这样易于获取俗名的东西反而基本放弃；其次是他的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作为基础，写文章能够不随意议论或阐发，尽量做到句句坐实，因此读完文章大多都是言之有物的篇章，他曾坦言自己即使写一篇千余字的读书笔记文章，所费的功夫则可能是读完所需要评论对象的全部作品，这种功力和耐心在今天或许会被认为是一种笨伯的做法，但恰恰成就了他的文章；而他所读书及论述向无约束，大都以自己的趣味做出发，尽管没有那种知识分子所常犯的“救世主”毛病，但我以为那文章的骨子里却是极为清醒的，若文章糊涂，即使学问再好，文笔再佳，也是根本不值一读的，这倒让我想起他在关于自己笔名的文章中的另一句话来：“《庄子·德充符》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我喜欢这个意思，后来写文章就取它作笔名。我是想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儿。”



也是五年前，我才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里买到一套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书趣文丛”，但独独喜欢谷林先生的一册《书边杂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1版）反复阅读和把玩数遍，竟成为床边常翻的读物之一；后来陆续购得先生的几册其他著述，一一读过，深深地被先生文字中的优雅精致和谦淡细密所打动，这些短小精美的读书文章既不承担救亡图存的

大任，又不履行学术与启蒙的探索使命，也没有名利双收的利益驱动，它更多的只是一个人通过读书对于光阴的消磨，因此他的这些文章没有野心，没有指向，没有私念，显得十分的单纯与清洁；也更如此，先生的读书文字产出很少，随性而作，细细打磨，精益求精，最终几乎篇篇也都成为了当下读书文章的上乘佳作。有趣的是，收录谷林先生文集的这套“书趣文丛”也是由俞晓群、沈昌文和陆灏三人策划完成。许许多多的好书就是在这些真正懂得书也真正热爱书的文人手中得到出版和流布的，诸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止庵所编辑的谷林先生散落的稿件《上水船甲集》和《上水船乙集》（中华书局，2010年1月）两册，另有南京《开卷》杂志主事者董宁文收集谷林先生散落的书信，编成一册《谷林书简》（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1版），皆是如此。不妨再加上早先谷林先生出版的几个小册子，诸如《情趣·知识·襟怀》（三联书店，1988年12月1版），《书边杂写》、《淡墨痕》（岳麓书社，2005年3月1版），《答客问》（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1版）、《书简三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9月1版）等，便是一套“谷林文集”了，幸亏我逐年跟进，苦心搜集，才不至于落空。而我还以为谷林先生的文字，之所以颇得很多读书人的真心喜爱，乃是因为他的读书随笔文章几乎都是以艺术与智慧的角度来出发的，从而显得十分优雅高贵又是难得的别致与机巧，与时下几乎泛滥的读书随笔文章相比，先生的读书文字有着独一无二的可贵品质。正是因此，我深深感觉到自己与先生在内心有着一种气味相通之处，那种寂寞中的自得与欢娱让人羡慕。读谷林先生的文字，常有一种感慨，那就是作为一个读书人，可能无法成为以天下为公器的“学术中人”，也可能难以成为兼济天下的“问题中人”，但若做一个以追寻艺术与智慧为快事的读书人，其实并非困难。因此，我读谷林先生的文字，常有一种心向往之的温暖之感。

图3 为1950年6月4日，谷林先生动身赴北京的前一日，在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先生墓前

THOUGHT 思想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1933 年，德国著名指挥富特文格勒给纳粹政府刚刚成立的“大众启蒙与宣传部”（RMVP）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件，请求戈培尔尊重艺术和保护犹太音乐家的地位。不知何故，戈培尔将此信以及“大众启蒙与宣传部”的回信一并登在了著名的自由派报纸《霍氏日报》（Vossische Zeitung）上，将这一争论公诸于众。



Bundesarchiv, Bild 183-L0507-504
Foto: o. Ang. | Februar 1942

从艺术角度看，富特文格勒此举目的，无疑是试图保护德国的精英文化不至于被新掌权的纳粹所摧毁，他在信中写道：

如果反犹太人的计划主要针对毫无文化积淀与艺术鉴赏力、表演枯燥乏味、庸俗空洞的人，那么这一切都是完全正当的。对于这些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偶然的产物，并不只局限在他们身上，无论怎样严厉抵制也不过分。

这段话读来意味深长，从表面上看，富特文格勒似乎“赞同”反犹行动，但是他同时又加上了一个附注：如果这种反犹太人计划只是针对“庸俗的精神”，那并无不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富特文格勒显然在信中表达出，这种“庸俗”并不只是犹太人的特有品质，因此不能仅仅以犹太人为目标。因此，Michael Meyer 在《第三帝国的音乐政治》（*The Politics of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1）中认为，富特文格勒其实是在非常大胆地表达对反犹以及大清洗运动的反对态度，而且他尽管在政治上犯有“右倾幼稚病”，也无论他在文化趣味上是如何的“精英化”，他在第三帝国时期毕竟还在坚持自己的艺术立场，并且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应对“宣传部门”的各项艺术政策，这些都难以一概否认。而有学者甚至认为，从 1936 年开始，富特文格勒其实已经陷入了一种“自我放逐”状态。

“自我放逐”，似乎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面对极权控制的最后之举，无论这是否是虚伪的自辩，还是迂回的反抗，都深刻地刻画出极权主义对于文化的控制力量之强大，但无论如何，从 1933 年到 1945 年，德

国毕竟只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仅仅维持了 12 年，文化精英们尚未被消灭殆尽，“自我放逐”的精神尚未完全萎缩为荒芜之境，“为意义而斗争”的精神暗流仍然流淌。但假如一个民族在极权体制下超过五十年，当传统的文化精英被不断的摧毁、消耗之后，这样的民族假如要孕育出“为意义而斗争”的动力，所需的时间又需要几个五十年呢？

崔卫平老师的《思想与乡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1 月）最近出版，蒙作者赐书一册，得以先睹为快。关于崔卫平的文字与其在当代中国公共思想界里所掀起的波澜，读者想必已经熟悉，无需多言。笔者在数年前，曾给她的《积极生活》写过一篇短书评，试图从“寻找生命的意义”角度来定位她的精神方向，蒙其谬赞。认真而言，我算不上是崔卫平老师最忠诚的读者，至少对于她的诗歌与影评而言，阅读所及并不多，但是一直以来总是隐约地认为，对于长我们一辈的知识分子而言，崔卫平既称得上是精神的向导，也是少见的“精神同道”。从“寻找意义”出发，80 年代的知识分子们或沉沦为权术的工具或阴谋家，或摇身一变为学院里的专家学者，但崔卫平却从审美层面上的“生命意义”出发，最后寻找到与政治公共生活的接榫之处，最终形成了她特有的“精神气质”。

是的，“生命意义”谁人不渴求？谁人不向往？但是一旦投身其中，背后同样也是陷阱重重，克服虚无主义，或许会走入更黑暗的虚无主义，而非清明的理性，以盲目热情拥抱信仰，那背后难免不是个人幻觉的自我放大。如何寻找到一条“中道”的意义之道，不仅仅是崔卫平所单独面对的生命议题，至少也是笔者一直苦苦探索的困惑所在。因此如果读者能以这样的视野去阅读《思想与乡愁》，或许可以洞察出作者的苦心孤诣，而更重要的是，是更为深刻地体会我们在当下社会中的具体生命处境，或许能给我们的公共行动奠定更具“意义”的价值基础。

塑造普罗大众的“生命意义”，让他们被规训、易于控制，当然是极权体制不可遏制的冲动。如伯林在《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潘永强 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 7 月）的扉页上引用了一段 1949 年在曼荷莲女子学院的演讲词：



共产主义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斯大林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任务，亦即，对人进行调适，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好奇心本身、个人独立探索精神、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这些目的本身确是人类的目的，能够满足我们天性中某些深层欲望），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一个整体性社会的和谐发展。

因此，苏俄式极权主义的着眼点，在于让人的心灵空洞化，乃至于“弱智化”，使得那些顺从者能在这样的体制中获得最大利益，而让“异议者”则付出最大的代价，这种控制的“政治经济学”使得这样的社会，会将“顺从”作为习惯，将“弱智”当作常态，最后有如羊群一般，将权力拱手相让于“伟大、英明”的牧羊人。

在这样的氛围下，恢复出人性自由探索的冲动，当然个人反抗的第一步。在笔者这些年的阅读史里，对当代写作者的判断标准，往往是看作者所从事的是否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写作方式，不是在某种流行思潮中附和几声，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完全面对自己的“私人写作”，在我看来，这种写作风格虽然不具有公共传播的长处，但是却能表达出一些重要的精神特质。



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想郑重推荐马慧元新版的《写意巴洛克》（三联书店，2010年10月），从私人交往而言，马慧元是我交往数年的乐友，至今还常常在网上畅聊音乐，她能弹能谈，反而谦称自己为“业余爱好者”，笔者这种当然更算是不入流的爱乐者，但有趣的是，交流下来却经常发现，对音乐的趣味与判断，我们常有不经意的一致性。最让我钦佩的是，马慧元那种对待音乐的高度“独立”态度。这种“独立性”不是自鸣得意地去颠覆过往的音乐传统，而是与流俗音乐思维之间划开界限，即不将音乐当作“消遣”的工具，而是看作是发掘个体意义的媒介。

这样的写作，获取掌声不易，成为大众媒体明星更是难得，虽然《北方人的巴赫》（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获得小众的一片喝彩，但是在国内少而粗的音乐写作之中，仍然谈不上有太广泛的影响，这也是笔者作为一名普通乐友常抱有的感叹。而作为朋友，我曾经数度克制一己的献芹之心，但如今看来，这种克制在如此单薄的古典音乐写作领域中难免显得有些矫揉造作。

恢复出常识感与个人的判断能力，自然是这个时代许多作者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不过对于笔者个人而言，常莫名其妙地有寻找某些不可探测领域的冲动，因此从个人的阅读与思考方面，佛教的确是我近年的一个学习方向，但是同时也深感，要让自己从“习惯性思维”作一次颠覆性的扭转，实属不易，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盲信，确立正信，或许是修习佛法的重要前提。最近出的一本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所著的《佛教的见地与修道》（马君美、杨忆祖、陈冠中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0月），则属于一本致力于澄清大众“正信见地”的引路指南，关于这样的著作，笔者不敢越俎代庖，而更愿意让大家自己放下成见，去作亲身的探索与思考。

本月推荐新书，实在寥寥，因此最后只能补充一本齐邦媛的《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10月），以作续貂。而关于此书，“独立阅读”其他诸位报告人当有更精彩、更细腻的评价，各位读者可对此抱以最大的期待。

图1为富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1942年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在上期“独立阅读”里感慨“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未能得到足够重视，话音刚落，《南方都市报》的雷剑峤先生就提醒这套丛书有一本《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赵宝骅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我居然漏过此书，赶快补课。作者克罗契科先生是一位出生于乌克兰的苏联化学家，曾获斯大林奖金，1958年、1960年两次来华，1961年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之机向加拿大申请政治避难，获得批准。1958年和1960年，分别是中国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在此前后，苏联也从“老大哥”变成了“苏修”。

因为有在苏联生活的经验，克罗契科对“中国特色”没有雾里看花的朦胧，不像欧美知识界的一些“天真汉”或“投资者”，碰到意识形态的形象工程就心悅臣服，半推半就。中国政府设立高规格的招待会，招待兄弟国家的贵宾，他也应邀参加，受到周恩来先生的接见，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出现，但是他没有像李敖、陈文茜一样受宠若惊，而是批评这种招待会：“不是设法去让自己的人民衣食无忧，不是去提高中国人民的物质与文化水平，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要在世界范围里投下政治赌注，为此不惜大把花钱”。克罗契科是“反华之心不死”吗？非也。1960年夏天，苏联决定撤回专家，克罗契科却想尽办法拖延时

间，帮助中国同行继续研究工作，临走之前赶写一份报告，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民天生就有能力从事科学工作，而且党和政府多次声称全力支持科学事业，而中国科学事业却依然处在如此悲惨的境地呢？”

可惜，“克罗契科之问”没有像“钱学森之问”那样，获得关注。即使“钱学森之问”获得关注，又能怎么样呢？诸位看官，你懂的。



齐邦媛先生的回忆录《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10月），读来“悲欣交集”。最初在书店见到此书，因为对作者有些陌生，没敢轻举妄动。大约三年前，媒体热炒鹿桥的《未央歌》（黄山书社，2007年12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让人心有余悸。后来知道齐邦媛是齐世英先生的千金，先后在中兴大学、台湾大学任教，桃李天下，依然未敢轻举妄动。“子以父贵”、“师以徒贵”，乃至父子、师徒互相抬轿子的现象，比比皆是。再后来，读到《时代周报》（2010年11月15日）的访谈，齐邦媛称：“印象最深刻的是抗战时期（1937-1945）我长大成人的八年。在那八年里，未被敌人占领的西南各省已有公平严格的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制度，政府在极困难的战时国库中拨出专款作战区学生公费，坚持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波澜不惊却气象万千，知道不可将《巨流河》和《未央歌》等量齐观，虽然大陆版是洁本，依然匆匆找到此书。

每天读六七十页《巨流河》，不舍得一口气读完。此前，读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章诒和先生的《这样事和谁细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野夫先生的《江上的母亲》（台北：南方家园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5月；大

陆版《尘世·挽歌》，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亦有同感。读后不敢高声语，只能一声叹息：多少家国烟雨中……

暂且不说那些宏大的主题，单是生命中的细节就让人念念不忘。1941年，作者所在的南开合唱团参加“千人大合唱”，结束后几辆军用大卡车送他们返回，在路上，卡车后面挡板脱落，学生们跌落地上，但没有受伤。《巨流河》这样写道：“那晚，我们在残破的公路上一面追卡车一面笑，沿路流过的嘉陵江在月亮初升之时美如仙境，战火死亡阴影下的青春有了片刻的喘息，那短暂的快乐令人永生难忘。”

“国破山河在”，并不让人彻底绝望，因为生生不息、弦歌不辍，人情世风尚能“春风吹又生”。“国在山河破”才是最让人绝望的，山河变色、礼崩乐坏，只能“欲语泪先流”。

《巨流河》有一处细节错误，齐邦媛讲到南开四十三班五十周年纪念集里有傅国涌同学的《呼唤人的教育》。傅国涌先生生于1967年，虽然他的这篇文章里讲到当年南开中学的老师，但他不是当时的“同学”。当然，这种细节错误完全不影响整本书的品质。

读过《巨流河》，恍如隔世。不是巨流河的年代恍如隔世，而是今天这个时代恍如隔世，拆迁、矿难、上访，神奇得如同另一个星球，神奇得仿佛并非人间。读过《巨流河》，一种乡愁挥之不去，虽然我所生活的时空和《巨流河》并无交集。这是文化的乡愁，在《巨流河》和前面提及的那些书里，都可以感受到故国之思，不是对故国君主之思，而是对故国文化之思。看到故国文化不绝如线，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喜于“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悲乎“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中华书局出版了“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顺手翻开《佛在人间》（中华书局，2010年6月）：“在佛在人间的见地去考察，释尊虽然出家，他没有忘却国族，那一缕故国之思，依然是活跃着。……那些以为信佛出家，就可以不再闻问国家民族的存亡者，不论他如何谈修说证，无疑是我佛的叛徒！”印顺法师是太虚法师门下，太虚法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太虚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6月）里，批评了把佛教看作“神怪、奸盗、闲隐、朽弃”的群众心理，同时批评了把佛菩萨等同为鬼神的观点。师徒虽有分歧，但是他们提出的“人间佛教”开出一片天地，不可忽视。

远鬼神而敬“故国之思”，这似乎与世人对佛教的理解不太相同。宗教常与“迷信”等同起来，印顺法师在《学佛三要》（中华书局，2010年6月）里区分了“正信”与“迷信”，他指出：“一般宗教，由于他力信仰而引起的自我安慰、自我幻觉，与由于心意的专诚精一而引起的某些特殊经验，虽大有作用，然信以为神或神力，还是迷信”。印顺法师接着指出：“迷信不一定坏，比没有信仰好得多”，但他同时又指出：“我们学佛，应以能所相应的正信为目标。”

阅读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的著述，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至于时下热闹的星云法师和净空法师，我总是难以亲近，或许朽木不可雕也。

讲到乡愁，崔卫平先生惠赠的《思想与乡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值得细读。在同名文章里，她讲述了伯林和阿伦特两种不同的乡愁，伯林从赫尔德强调人归属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习俗传统出发，注重乡愁的思想出处；阿伦特更为注重人与人之间自由对话、分享和交流产生的“休戚与共”（friendship）的乡愁，未必要从同一种思想传统中出发，而是注重“世界公民”的身份。崔卫平谈论的不仅是伯林和阿伦特，苏维埃和法西斯，更是当下，一个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了乡愁的时代，一个思想与乡愁正在缓慢生长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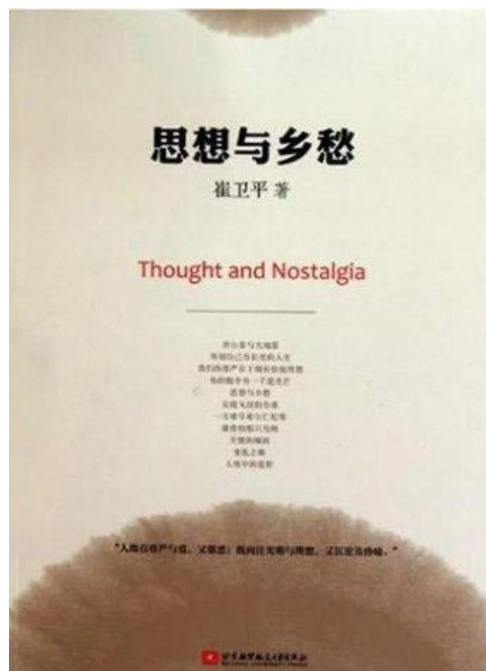
徐贲先生的《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9月）具有与《思想与乡愁》一样的现实感。公民社会不仅需要宪政国家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存活，也需要与“群众社会”作出一定的区分，正如社会运动不能等同于群众运动。如果不对这两者进行区分，就会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以“社会”为主义的国家，社会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一旦出现就会被视为“黑社会”。不要紧张，我说的是希特勒先生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时代周报——2010影响中国时代进程的100人”评选中，崔卫平当选“年度公共知识分子”。徐贲在《崔卫平：公民知识分子的选择》（《时代周报》12月13日）中称崔卫平为“有公民担当的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徐贲，也适用于艾未未、周云蓬、郑小琼，他们是艺术家、歌手、诗人，也是公民。但我不太喜欢“公民艺术家”、“公民歌手”、“公民诗人”的说法，这种前缀既赋予了艺术家、歌手、诗人特别的意义，也很容易成为他们创作时的“紧箍咒”。

艾未未的《此时此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能够出版，最需要致敬的不是作者，而是出版者。正如崔卫平当选“年度公共知识分子”，最需要向《时代周报》编辑致敬。我更喜欢艾未未的纪录片，如《老妈蹄花》，对《此时此地》的内容没有兴趣，但是依然买了一本以示致敬。与《此时此地》同属“理想国”系列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是一本严谨并且畅快的当代中国经济史著作。这本书的内容曾在《经济观察报》连载，一位经济学界的前辈曾致信作者柳红：“现在我们坐在沙发上讨论改革，当年老一辈是在政治刀尖上探讨改革。”这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当沙发上的讨论越来越言不及物，又不免让人缅怀刀尖上的探讨。

周云蓬的《春天责备》（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是等待已久的一本诗集，很多年以前我曾收到一本叫做《低岸》的诗歌民刊，印刷有些简陋，内容却一点也不简陋，过了很久才注意到周云蓬是主办者。11月，周云蓬来上海开演唱会。我赶去“追星”，结束后一起夜宵聊天。周云蓬拥有清晰并且健全的“常识”，这在当下的音乐人中是不多见。许多音乐人（以及艺术家、诗人、学者），喜欢以“玄学”代替“常识”。我智力有限，难以接受。我所能接受的“玄学”，是生长于“常识”之上的，不是把反“常识”当做深刻。

《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是一次迟到的阅读。此前，因为媒体和评论家把郑小琼归入“打工诗人”、“底层写作”的序列，我一直对她保持距离，因为“打工”或“底层”无法给“诗人”



和“写作”提供任何担保。一边读《郑小琼诗选》，一边忍不住腹诽那些媒体和评论家，郑小琼的诗歌远远超出对她的归类。《魏国记》隐约有点阿多尼斯《T城》、《Z城》、《G城》的感觉，但郑小琼未必受到过阿多尼斯的影响，她对诗歌和这个时代的理解，让我觉得赞美也是多余的。

上次留待下回分解的《这里不平静：非洲诗选》（冷霜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8月）、张佛泉《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尚未见到，继续留待下回分解。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JAPAN 日本

枕头边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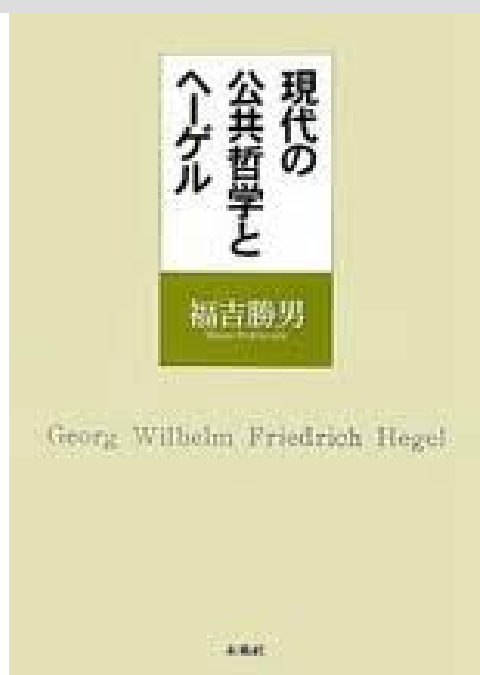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

（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

这个星期（11月7日至13日）枕头边的书（每天凌晨3点左右醒来读一会儿再睡，基本每周图书馆还了书，都要换一批）有列奥·斯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此书在上海买的，其余都是借来的日文书，这里乱侃日本书：

1、年轻一代日本女学人梅田百合香撰写的新书，《复苏了的利维坦》（講談社、2010年6月），她将霍布斯的《利维坦》与阿伦特、列奥·斯特劳斯、内格里等人的反现代之间的著述之间联系和比较，深入浅出，很好！系东大博士论文，博士毕业后，工作好几年后才完成。2、日本青年一代学人大竹弘二的巨著《正义战争与内战》（《正戦と内戦》，以文社，2009年11月）。该书不是从法政体制角度，而是分析施密特的国际秩序思想为何在战后，特别“9·11”后受西方极右和极左两派欢迎，根源是后发的强国有一种被既成世界秩序——一种难以接受的普遍主义支配的屈辱和嫉妒，很厚很厚，大约折合汉语350页篇幅，光西文文献涉足200余种。这也是东大博士论文，很好！不是刘瑜所说的、我国那几位老是发问“今天你施密特了没有”的大师的泛泛而谈的、那种批判美帝的著作。如果每天想谈施密特，不懂德语无所谓，懂日语也可以天天谈，因为施密特著作基本上都有日译本，日本人1930年代要走法西斯道路，开始注意施密特，翻译施密特、学习施密特。3、名古屋大学在读博士生（70后）伊东祐史的硕士论文《日本人对战争有当事者意识吗？》（《戦後論＝日本人に戦争をした当事者意識はあるのか》，平凡社，2010年7月）作为硕士论文能在平凡社出版，可以想象超越当今日本人一般文科硕士论文水准，篇幅也不小，有300页。该书从加藤典洋的败战后论说起，通过日本几乎所有战后反战最著名左翼知识分子的著述个案（包括最大腕丸山真难、鹤见俊辅、竹内好等人）指出没有在战争中当事者意识是个很大缺陷！即使今天日本批评现状的知识分子也缺乏当事者意识，自己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当为些什么？对反省、责任问题是一个重大缺陷，呵呵，这硕士论文水准和我见到过的盛世天朝内地硕士，呈南北极地呀！我当然也是当今中国盛世的当事者，给三流大学代课，谋了几年苦饭，制造不少坏产品。4、旧翻新、新版西人旧书，日本人翻译的《布达佩斯的世纪末》（John Lukacs: *Budapest 1900,1988*）介绍1900年当地的城市文化历史，不要说柏林、维





也纳，匈牙利毕竟所属奥匈帝国，100年前布达佩斯学术、艺术也有过辉煌的一页。从书中可以读到，匈牙利民族文化在西欧文化冲击下的两难的抉择。5、日本人翻译的韦伯《经济与社会》中一章《官僚制》（角川文库小册子，1958年初版），一读就感觉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的韦伯台湾译本《支配社会学》受日译本影响之深。重读很爽！犹如韦伯百年前痛击“亚细亚的狡黠”，当今中国学界发明“行政化”这个词。反行政化激进分子连“官僚制”（Bureaucracy）这个现成社会学专用的词不敢用，发明一个中国特色的学术用语：“行政化”，荒唐得还要恳请最高行政首脑宣布取消行政化。好像最高行政首脑两会宣布要免除大学行政化了，雷声巨响。6、日本后学左派的同仁刊物《现代思想》，2010年8月号是纪念德鲁克诞生100周年的特别号，特别是因为德鲁克1970年代曾推荐过日本企业年功序列经营模式，80年代见这模式维持不下去而否定了。俺自以为是有点了解德鲁克，所以，也想细读东洋学人的见解，吸收点养料！与日本后学左派很熟的中国同行，为何不谈谈德鲁克？

二

上星期（11月1日至6日）枕头边的书，就简单说说，一笔带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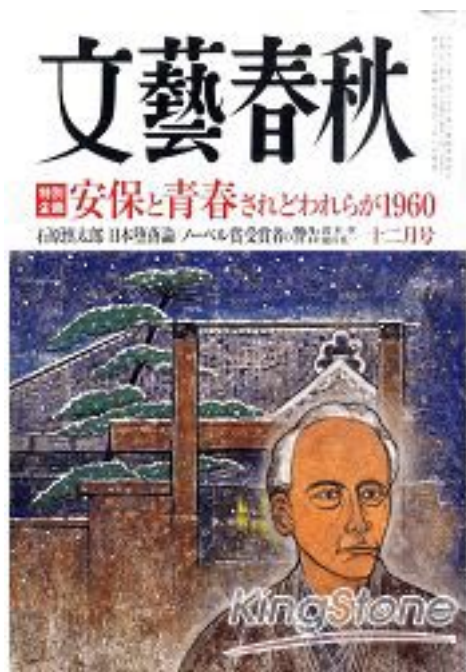
1、中文版的韦伯《俄国革命论》（上海三联，2010年7月）。中国大师叫学徒翻译的，译者似乎不很熟悉韦伯，也不熟悉俄国革命。2、日人翻译美国女权主义学者D.康乃尔（Drucilla Cornell）的《拥护理想》（《理想を擁護する：戦争、民主主義、政治闘争》，2008）。康乃尔观点，与其他许多西洋左派一样，虽抨击布什伊拉克战争政策、一神教主义，却不否认人类具有共同理想。3、日本人福田胜男写的《现代公共哲学与黑格尔》（《現代の公共哲学とヘーゲル》，2010）。该书的新意在于通过构成近代社会的“家族”、“市民社会”和“国家”三者关系，梳理出黑格尔公共哲学也是主张建立公民社会的。第4、5、6、7本，我都读得很马虎，第4、5两本新书是日本人白石嘉治的《不纯的教养》（《不純なる教养》，2010）和白井聪的《追求物质的起义》（《物質の蜂起をめざして》，2010），两者都是后学学者，白井聪很年轻，70后。前一书说的是我们处在的现代社会如何使我们接受许多充满了使时空倒错的、梦幻的、不纯的教养；后一书通过弗洛伊德、法国后现代主义以及日本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涉等人的著述、思想重新读解列宁。因为我的知识根底，接受新产品很困难，这两本书最后都没有读完。第6本日本人写的历史小册子（好几年前出版的“中公新书”）很有趣，读起来轻松，但是年纪大了，也正因为读得轻松，作者和日文书名很快都忘了，只记得作者北海道大学教授，当过驻苏联记者，书名翻译成中文，连副标题在内该是：《从当时（1917年）俄国报纸的报道读到的彼得堡的日常生活》，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彼得堡混乱，抢偷盛行，临时政府警察和激进政党的警察——两种警察面对武装兵痞都软弱无力。因为治安问题，富人都在这个时期迁出彼得堡。特别引人注目的中国华侨给端了好几次地下鸦片馆。一战时，去俄国的农民工喜欢赌博和大烟。第7本，即 Sissela Bok 的《共同价值》（Common Values），以后有机会的话，倒想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偷懒——以放在以后细读。

总之，翻过的书都很精彩。这类书看了，感觉正如范美忠说的那样，国内多充斥一些出于大师之手肤浅的、读起来不感觉到难的书，或犹如稀释了的茶和酒，或假酒（甲醛）、高浓度农药茶，怎么过瘾？中毒倒有可能。要介绍域外的书，写不完，想开个介绍所了。俺眼高手低，只配介绍介绍，不少时候还介绍不好，中国纸媒还不要我介绍，什么都要大师出面介绍，国务院津贴专家、博导等卡里斯玛效应，在读书界才有眼球引力。

JAPAN 日本

那些愤怒的年轻人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日前,《文艺春秋》新刊(2010年12月号)上首次公开了雪藏二十七年的前首相岸信介与著名社会学家、前学习院大学教授清水几太郎的对话录音记录,旧话重提1960年安保运动,再现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峥嵘岁月。

谈话者曾经是一对针锋相对的宿敌:岸信介时任内阁总理大臣,是《新安保条约》的始作俑者,学生反对运动的主要诉求,就包括阻止岸访美、首相“退阵”和解散国会,均与“倒岸”有关;而清水几太郎作为自由主义学者,是知识界“安保批判会”的核心成员,学运主体“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的理论代言人,学运“黑手”第一号。基于如此针尖对麦芒的利益冲突立场,这场对话自然不可能发生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事实上,对话是在1983年4月,那场学运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时岸已从政界隐退近四年,并将在四年后往生;而清水则已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向:1980年,于右翼杂志《诸君!》发表著名论文《核的选择——日本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公然诉诸军力强化。十年后,左翼社会党出身的村山富市首相代表政府郑重承认了日美安保体制的有效性、合法性。至此,经过经济过热的八十年代及其后的

“后泡沫经济”时代,早已成过去时的安保运动的意义在被一点一点地消解之后,仿佛成了彻头彻尾的历史迷误。与此同时,“后冷战”、“反恐”和“中国崛起”等新地缘矛盾的凸显,仿佛又在逻辑上无言地诠释着安保体制的“正确”。历史的戏谑,诚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1960年安保运动的话,那就是“愤怒”。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不啻为一场不折不扣的“愤青运动”。既然是以左翼愤青为主体的社运,日共自然脱不了干系。可事实上,彼时的日共,已深陷党内斗争,同时在以何种形式在战败国日本构筑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问题上迷失了方向,在广大愤青心目中早已OUT。与其坐待日共的“调整”,不如自己起来打造“先锋党”,进而有效地开展大众运动,酿造共产主义的形势。于是,1958年底成立了“BUND”(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即后来成为制度经济学大家的青木昌彦,该组织旋即成为“全学联”的领导核心。那些因愤怒而焦虑的年轻人看透了日共,决心以自身的力量把混沌的日本导入共产主义的轨道。这成了六七十年代独立于日共和社会党之外、被称为“新左翼”社运的缘起。

应该说,青年们的愤怒有相当的情绪性,其主要来源有三:其一是对岸信介的反感。岸其人在“大东亚战争”爆发时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日本战败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虽然在东京审判上被判“不予起诉”,并在东条等七名甲级战犯被执行绞刑的翌日,黯然走出巢鸭监狱,但却被褫夺公职。出于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国民“恨屋及乌”。加上岸身上有种旧时代精英官僚特有的傲慢,更令呼吸战后自由主义空气而成长起来的左翼愤青们不爽。其次是大众传媒的影响。彼时的媒体,以左翼的《朝日新闻》及其旗下的新闻周刊《朝日 Journal》和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为代表,对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可仍难脱媒体的“根性”:拿批判当下的领导人、政治家当饭吃。再次是反美民族主义,被占领时期民生的窘困和占领结束后政府一味的对美追随加剧了国民的屈辱感。当然,这一层中也包含了对支援越战、良莠不分的日本的搓火。

这样几种愤怒情绪,加上青春期肾上腺素的过剩分泌,一场旷日持久的被称为“革命”的社运便拉开

了大幕。高潮时，三十三万名群众包围国会议事堂，要求即刻解散国会、岸“退阵”。沮丧的岸信介躲在一箭之遥的首相官邸，和时任大藏大臣的胞弟佐藤荣作一起喝着闷酒，耳畔不断传来一波又一波的“安保，反对！”的声浪，脑子里甚至闪过一死了之的念头。岸毕竟是旧时代的政治人物，最绝望的时候，甚至要求出动自卫队镇压。但此要求却遭到防卫厅长官赤城宗德和陆上自卫队幕僚长（相当于司令官）杉田一次的共同抵制：赤城在退回首相命令时，附上了自己的辞呈。

据前经团联理事、《产经新闻》社长、与岸信介私交甚笃的实业家水野成夫回忆，他当时一个劲地给时任岸内阁官方长官的椎名悦三郎打电话，拼命敦促收回出动自卫队的成命：若当时出动自卫队的话，日本“将回到 1905 年”。后来，在一次以国会为目标的万人规模请愿活动中，因前方与手持警棍的警察发生冲突，“人群雪崩”导致东大文学部的美女学生桦美智子成为踩踏的牺牲。验尸时，水野真正感到了内心的恐惧，唯恐从遗体中发现枪弹。“等压迫死的尸检结果发表后，才算松了一口气……”



随着 1960 年 6 月 19 日零时，《新安保条约》的自动生效，学潮以挫折告终。那一夜，在国会前请愿的学生迟迟不肯撤离广场，直到天光泛白。当国会议事堂的轮廓线逐渐清晰，在灰白的天幕下变成一幅完美剪影的时候，不知是谁先起了个头，然后整个广场上响起了流行女歌手西田佐知子的名曲《当金合欢时节的冷雨停了的时候》的合唱：

金合欢时节的冷雨打在身上
我多想就这样死去
天亮了 日出了
在熹微的晨光中
凝望着浑身发冷的我
那个人
会为我流泪么

啊，一切都结束了。等待着这群莘莘学子的，是激情过后的求职活动。紧接着，是以“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代表的经济转型。而下一次“激情燃烧”，则要等到八年以后。

图 2 为 1960 年 1 月 15 日，岸信介首相前往美国参加新安保条约草约签订仪式，700 名学生到羽田空港静坐抗议。

BOOK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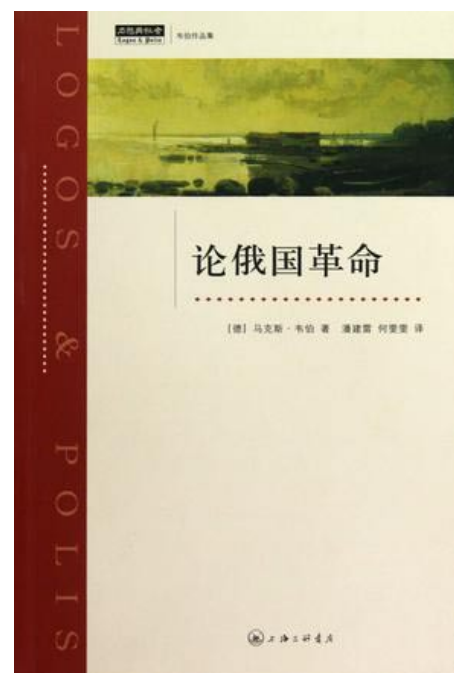
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三）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上海，sunchuanzhao@yahoo.com.cn）

写了“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一”、“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二”后，没有马上写“之三”，原因这“之三”才是笔者要表述的论旨，前两篇是铺垫，但是前两篇发表后，人微言轻，读者反响寥寥，写作失去原动力，拖延着不写，只是因为“之二”的末尾，交待了“待续”，今天马马虎虎草草写“之三”做个交待。

首先要说的，我十分佩服首创中国“大学行政化”这个词的那位中国学者，我无从查起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哪里，但是可以推测这是从 1990 年代末法学界的“法律行政化”那里假借来的。我是中国学术界之外的硬要顽强表现自己的弱势票友，不得不“入乡随俗”在“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一”、“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二”中还是因袭这个诡秘的专门用词。其实，行政制度研究大师马克斯·韦伯早就有一个学术概念：“官僚制”（bureaucracy）。我在“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一”、“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二”中所举的“大学行政化”两个例子的美国、德国，它们的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学者当今分析大学学制和行政管理问题时，依然运用“官僚制”这个词。中国学术界虽然一度（1980 年代？）把它翻译成“科层制”，可是 1990 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经济与社会》中译本出版后，特别 20 世纪末开始，大陆也开始和日本一样把它翻译成“官僚制”。而且，关于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的大同小异的“学术论文”（简体中文）铺天盖地，多出自谋取学历的行政“官僚”之手，那以后些论文的写手都不读韦伯的著作、强奸韦伯的著述本意，认为韦伯推崇“官僚制”，而“官僚制”虽然有理性、合理、提高效率一面，却不适应现代社会产生种种新问题，所以要研究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因为“官僚制”这个学术概念（一）是马克斯·韦伯提倡的、不是卡尔·马克思倡议的；（二）“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主义”、“国民党官僚”等词在现代汉语表达的传统上是贬义词，加上（三）它不适合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所以不能、也不可能让它出现在描述、分析当今中国教育制度的论文中，因此在“大学行政化”过程（中国特色官僚制的过程）中**获益者们**不能违逆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使用“官僚制”这个既有的、与国际接轨的学术用词，于是就把“行政化”这个词创新地在教育学科研究中移植、取代了“bureaucracy、Bureaucracy”。

实际上“官僚制”是韦伯研究人类社会史、经济史时，总结、概括出来的一个概念。除了散见在他的各种著述中，在《经济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台湾译本《支配社会学》）有专门一节谈论官僚制，还把这种制度与教育上的西方国家新科举制（公务员考试制度、职业考试制度）及传统大学沦陷为职业训练机构之历史结合起来谈。（几年前拙文《教育的目的和卡里斯马效应》曾作比较详细介绍）韦伯认为现代化过



程中民族国家行政结构，因为庞大起来、迎合工业化的效率，都绕不过“官僚制”这个坎，是一种必然，而且，一旦走进了“官僚制”就宿命地永远摆脱不了这样的构造。不知道最近提倡时髦的“去行政化”学者们读过韦伯这些著述吗？可能我比较迷信韦伯这样的权威和经典（卡里斯马），对这些激进的“去行政化”呼吁付之一笑。就以美国的大学为例，我在“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一”提到的百年前美国大学的“行政化”是一种企业内部的“行政化”，按照美国学者 M. B. Katz 的说法：是一种企业任意制（corporate voluntarism），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美国大学发展时期，私立名牌大学普遍是将企业任意制（corporate voluntarism）与官僚制嫁接[当时美国州立（公立）大学追求民主的地方分权制（democratic localise）]“但是两者都追求发展成综合性大学，而且大学都缺乏一种一贯的办学核心宗旨，所以失去解决所面临的涉及社会重大道德问题的能力。”“民主主义与官僚制、地域共同体与市场主义之间对立紧张导致了裂痕”（黑体字——引用者）：“知性自由与道德松弛二律背反地共存”。（M. B. Katz, 1982: pp.3-4）1980 年代以后的 30 年中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后，美国的大学官僚制日益强化。但是这种官僚制和我们的行政化，在微观上有许多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最主要的双方的教育市场背景有很大区别，美国大学来政府干预很小。而我在“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二”提到的百年前德国大学的“行政化”随着其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极端发展而发展，走向具有德国特色纳粹主义官僚制。

最近，戈登·威尔斯（Gordon C. Wells）、彼得·巴赫（Peter Baehr）编译的马克斯·韦伯的专题论文集《论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95）中文版（潘建雷等译，上海三联，2010 年 7 月）问世了。此书所收的韦伯 1906 年写的一篇文章《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中，韦伯把学术自由和大学体制作作为宪政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用了大量篇幅（第 186-192 页，做了删节）叙述、分析俄国大学体制与学术自由的问题。韦伯希望俄国的自由主义立宪派、地方分权派知识分子能引导俄国人民结束沙皇专制统治，希望革命后的出现一个民主的邻国俄罗斯，给政治上同样落后于西欧诸国的德国政体发展创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而俄国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仅都与大学、大学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大学师生分别积极参与俄国各个政党的政治活动与斗争，更何况大学是该时代各种思想、学说最活跃的“场域”。他在关心俄国革命和宪政的时候，眼光自然不会遗漏了大学这一重要议题。英国研究韦伯的权威学者凯斯·椎柏（Keith Tribe）认为韦伯在第二学术时期、1903 年至第一次大战爆发关心德国大学学术问题和学术界公共事务；一战爆发后至 1920 年代的第三学术时期，韦伯一直在“宗教论著与反思一战对德国政治的影响”。（41 页）而《论俄国革命》所收韦伯 1906 年写介绍、分析俄国革命文章，实际上都是涉足政治又带有学术性的时论。我翻译的爱德华·希尔斯编译的《韦伯论大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一书所收的韦伯在椎柏所说的第二时期为当时报刊的写稿——批判普鲁士大学行政制度的时评、论争文章，实际上也都带有政治色彩的时评。我们读了该书中韦伯关于俄国大学的这些论述后，会发觉：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替的年代，俄国的大学和德国的大学发展水准和处境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教授评议会治校下的学术、教学传统体制正在瓦解，在国家权力干预下直接进入官僚制。

另一方面，正如《论俄国革命》编者戈登·威尔斯、彼得·巴赫在《编者序言》中所提示那样：韦伯的首要敌人是现代社会以貌似理性面貌出现的“官僚家长制”（Bureaucratic paternalism），因为它是一个等级社会，无以复加的例行化、工具理性及非人格化，以牺牲个人责任为代价来取胜。他担心，俄国那样后发的现代工业社会国家及其激进的政党更倾向于这种“官僚家长制”，而不是消灭它。（29 页）而且沙俄官僚制与黑暗警察制度结合在一起，不仅立马取缔了欧洲中世纪以来教授治校的传统，影响立宪民主的进程，也导致大学体制现代化的滞后，在该书多处韦伯都表达了他对俄国特色的大学官僚制的忧虑和批判。大学发展方向不同，反过来也预示未来国家体制发展方向。韦伯对俄国大学现状的叙述和评价，与其同时期对普鲁士教育体制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这是韦伯教育观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积极提倡“去行政化”学者不愿意涉足的学术范畴，所以，他们对非常时期（转型期）的当前大学行政化研究只能停止在一种单纯的现象描述水平上。（“转型期”这个中性词，不知道哪一位首创的，韦伯在《俄国革命论》中所说“亚细亚的狡黠”，真是一种难得的智慧！），甚至有些很激进大学行政化的批判者也看不到清末到 1949 年半个多世纪中的“大学行政化”，无限美化那半个世纪中的“学术自由”，如果那半个世纪中留下“学术自由”传统，还有今天的“行政化”？

最后，在匆忙结束拙文时，我还是要不怕触犯众怒，要对积极提倡“去行政化”的学者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问题**：你们恳请中国最高行政长官、教育行政机关乃至国家任命的大学校长放弃、淡化行政化（把恳求他们放弃副部级待遇看作很重要），且不说他们愿意不愿意放弃、淡化“大学行政化”，假如出于他们的行政命令的放弃、淡化，本身不就是“行政化”吗？恕我直言，不少人丧失这样简单的逻辑思维能力本身是这种“行政化”的结果。

BOOKREVIEW 书评

这一次，论尽我的一切

观察员 朱白（广州，youjinma@gmail.com）

《夏日》是继《青春》、《童年》之后的所谓“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终结篇。这里有必要先说说“自传体小说”这个概念，在我看来，文学评论家们“杜撰”出来这样的概念，实在是偷懒的做法，小说即为虚构，或者也可以不虚构，所谓不虚构也可称之为虚构。简单说，就是不能因为作家动用某些真实的情节、真实的元素，就否认其虚构性，虚构是小说的唯一手段。那么“自传体小说”就不应该存在，小说成立之时，就应该将其情节看成其中的元素，虚构还是真实不是问题，采用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或者主观将之美化、篡改，都不是问题，小说中的一切皆为虚构而来。带有真实性能的小说，怎么说都还是小说，没有必要再硬造出一个“自传体小说”来应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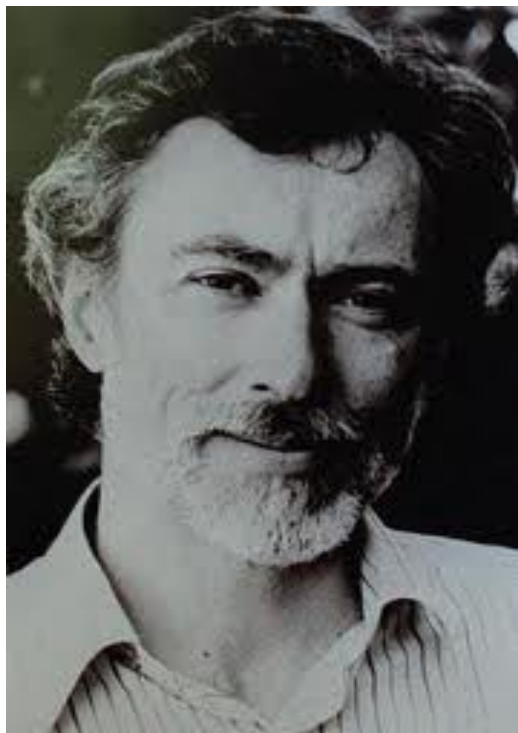
自传体小说，充满悖论的一个名称，至少在我来看，这部《夏日》可以分两种来看——一是自传，库切自己给自己作的一部传记，既然我早晚都要死，而死后难免被众人议论和书写，那么不如我自己先来，2009年的库切早已经是世界性名人，写一部传记说得过去，他想深度地发掘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所谓人生道路上的那些微小细节，只能以这种“连窝端”的方式一次性将自己清空；二是小说，库切的一切形式都是为了小说准备的，不存在现实经历，只有形式的推敲和琢磨，也就是说这是库切发明的一种新的形式。两种阅读体验方式，没对没错，随你怎么看。我的意思是，聪明的库切早就将两种人的嘴都堵住了，他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自传还是小说，决然分开的阅读，也就说如果你一边读一边揣测这一部分是否是作者的虚构、是否是他真实生活经历、又有多少重叠，那将是非常失败的。要么完全信以为真，要么看成一部小说的任何元素皆为虚构，我就这个意思，不能纯粹地看，实实在在地糟蹋这部小说的一种阅读。当然，你也可以聪明地说，里面的很多细节根本与库切本人的经历不符，比如《夏日》中的“库切”在这段时间是一个近乎性冷淡并没有结婚的人，而库切在此时的经历是结婚并有一子一女——这就让人没办法全盘当成自传去读了吗？你仍然可以相信，或者你可以作突然发现状，库切隐婚了耶。

所谓“自传体”的最大证据，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叫“约翰·库切”，并且里面的若干情节完全有出处，不但在库切的以往小说均可找到相关情节，更可以直接对照库切的个人简历。但这也许正是库切愿意干的一件事——真真假假，让你难以分辨所谓的虚构和真实。作家用可追寻的细节，来填充自己的故事情节，这并非独特，也非投机取巧，而是自然而然的手段，一切都是为了小说的圆满。我觉得大家与其考证般地解读这里八卦情节的真伪，不如放下紧张情绪，好好来欣赏这样一部注将进入人类文学史的伟大作品。



给死去的自己写一本传记，这个想法对于小说家来说不难，但能在实践中将之完成并抵达这门艺术的巅峰之处，就没见什么人能做到了。在我看来，此时的库切已经处于小说艺术和技术的最巅峰状态，就是



那种无需多想，出“笔”就能命中。凌乱、不加累赘的逻辑解释，也不要再说这一切都是库切精心筹备、逻辑缜密了，说真的，库切在处理这种小说上已经无需“精心”，只要听从心的召唤，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惊世骇俗。如果你看过《青春》，并对里面的片段场景击中过，就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

库切没有想完整地“库切”的传记，即便从1972-1977年，也是片段的、间歇的，有一种信马由缰想到哪写到哪的感觉。但显然库切是经过测算的，所选取的五个人物访谈、五个视角，都是贴合他要表达的内心的。从“库切”残存的日记中选定了五位相关的人物进行采访，“库切”的老情人朱莉亚、“库切”表示过好感的表姐玛戈特、“库切”曾经苦苦单恋过的舞蹈老师阿德瑞娜、“库切”在开普敦大学教书时的好友和同事马丁以及另一位同事兼情人苏菲。访谈只是草稿，保留许多原始录音部分，这并非粗糙哦，大概库切是想让读者也同时知道资料的来源和取证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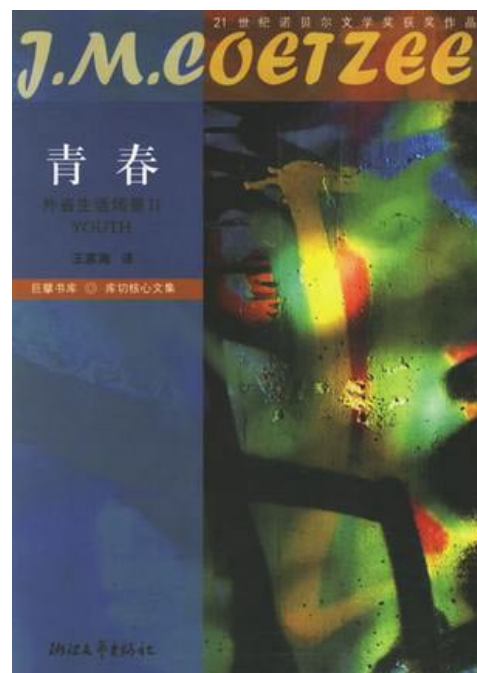
《夏日》的“茱莉亚”章节中，“库切”爱上了一个事先张扬要勾引他上床的女人，但是这段爱情在当事人茱莉亚的描述里，丝毫不见男欢女爱式的激情，只有一个中年沉闷男人孤

独的背影。如果说库切在这部小说中，想彻底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孤独的旅者、可怜而无能的男人，那么，他得逞了。他集中了被采访的几个人多重视角取证，“库切”的孤独和无能是无可争议的。

库切的照片不难找到，你看他的样子，轻易就能得出结论，这不是一个丑八怪，也非一眼即知的猥琐男人，但库切几乎不留任何情意让五个人分头证明，这个“库切”除了后来成名成为伟大作家以外，三十几岁的南非生涯，简直遭透了，而这糟糕的境遇又都跟他孤僻的性格以及荒诞平庸的外形有关。库切并非不敢触碰自己真正死穴的作家，看《青春》和《耻》这类小说你就知道，如果没有深入到人类内部的经历和思考，是没有人能写出哪怕是看似随意的那些情节的。但库切为什么这一次在自己的外貌上这样“不诚实”呢？他将自己人生的失意，总是有意无意地与外形扯上关系，除了工作上的低落，还有男女之事上的惆怅，库切有意无视“库切”内心的狂躁，甚至不为“库切”说上一句公允的话，任几位被访者的侧面攻击，“性冷淡”，多么极端的字眼，成了大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的几年里生活写照。外貌可以随意调侃，我猜，此时的外貌是库切对照内心的一种巧妙写法。

读库切以往的小说，有一种感觉，就是透过他的情节，总能让人找到某种精神上的共鸣。我问过同样喜欢库切的几个朋友，有人告诉我，《青春》或者《耻》里的某个情节，尽管跟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却在某一刻让他有了当头一棒的感觉。所谓被击中，在我看来就是阅读小说的最高境界。当然，你说被气到了，被吓到了，或者被煽情的情节感动哭了，这也是感官震撼，但真正的灵魂震撼，只有体会到了你才明白。库切不动声色地用最简单的情节去震撼他的读者，在我看来这就是伟大文学作品的功用之一。

对于个人阅读体验来说，能在二十几岁读《青春》、三十几岁读《夏日》，这种时间上的暗合让我非常得意。对于写作者来说，只有“过去了”才能回望，以及回望之时认真面对，通过《等待野



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圣彼得堡的大师》、《耻》等二三十年的写作，在他六十多岁时赢得了世界的承认，这个时候他一定知道，所谓荣誉、所谓名声已经不可能再跑了，或者说，他为之奋斗的终于有了结果（不得不承认世俗眼中的成功，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何时都是有效用的，这在库切的小说中也不难发现），那么他可以回望过往了，《青春》就是一部他可以正视自己之作，哪怕是这种正视本身就是一种灼伤，对于此时的库切来说，已经具备了承受的能力。如果说《青春》是库切对自己年少岁月的一种审视和揭露的话，那么等到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地球最大的文学奖项，随后创作的《夏日》就可以称之为暴露和戳穿自我的作品。1972—1977年短短六年的几个片段，在我看来，库切已经论尽了自己的一切。狡猾的库切在别人绞尽脑汁如何创新的时候，返璞归真般用了一种最省力的方式，彻底将自己的“一切”宣泄了个够，一次性的，论尽有关自己的一切。所谓一切，就是一个人成熟时期的爱恨情仇，包括那些未遂的爱恨情仇，用贴近地面的方式，不惜看穿自己的猥琐和无奈。他愿意撕开外衣，然后再拨开自己的皮肉，露出一副不那么健康、更谈不上什么美感的血肉之躯给你看。六十几岁，世界上的著名奖项尽收，在荣誉与生命达到那个美妙的交叉点后，库切似乎真的可以放下一切来极致地说自己想说的话了。从对自己残酷的程度来说，库切的这部《夏日》远比奈保尔的封笔之作《魔种》更严厉和极致，几乎没有余地，更没有留情地将此时的一个年老、隐居盛名之下老男人的曾经过往的困顿年华呈现了出来。

决绝也许不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高的赞美，但对库切来说，他能将之完成得如此优雅并直抵人类内心最敏感的部位，这就是天赋。库切借“库切”之口说：“不管怎么说，‘你有更好的想法吗，’约翰说——‘一种比写作更好的消磨生命的方式？’”库切并不是唯一一个把孤独作为写作必要条件的作家，但他是领略此精神后得到神助并真的完成了人类最巅峰的那个人。老情人“茱莉亚”一章节里，库切让“茱莉亚”来形容“库切”时说，他是“一个喜剧人物。面无笑容的喜剧。”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自画像，无论如何，他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悲剧的时代。“我当然见识过他性欲冲动之下的这般举动——但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深陷于情感之中。”冷静、沉稳、压抑，库切喜欢以这样的面目展示给世人。正是这样的决绝，库切已经走入了人性深处。

库切对待女人的态度，在《夏日》中没有直接描述，但却已经精准地告诉了大家，他折磨自己，爱与被爱，都是极其桎梏的事情，仿佛让“库切”呆在瓮中，就是库切的题中之意。在交响乐中与情人做爱，更是在一个没有交响乐的环境中，你能想象出来，这是多么复杂和悖论的一个人啊。水瓶座的库切（2月9日），内心复杂，有时候连自己也容易陷入悖论之中，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不难见到。还有，说到星座，这真是个怪东西，对号入座非常有效，星座上说水瓶座的男人“40岁左右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注定的人生转折，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抛弃过去，奔向新的未来”，库切1980年代离婚，选择了看似“人生转折”的新路，也是这个时候再早一点，这部《夏日》所叙述的1972—1977年间30多岁的库切，他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作家了。

在《夏日》里库切引用“库切”南非老情人苏珊的话来评价自己——“他的作品缺少一种追求的目标，无论从哪里都感觉不到作者的‘惊人之语’。总而言之，他的作品太过于沉稳，规整，节制，缺乏激情，因此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不是库切对自己的谦卑，而是某程度上他愿意这样解释自己。沉稳、规整、节制、缺乏激情，这在小说作家那里，从来都不可能简单地唤作缺点，甚至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位优秀小说家的应有素质。库切很聪明，用一个可争议角度来阐释和看待自己，当我们将之看做库切对自己的深度解析时，我们也应该把这样的评语看成是库切对小说的理解之一。

《夏日》里库切用几种视角、几类人来回忆他们各自眼中的那个“库切”，不管误差多么大，还是历史机遇的某种巧合，有一种看法是绝对成立的，那就是“库切”的犹豫和孤独，是近似于强迫症般在压挤着他的精神和肉体。我想，如果一个干脆利索的人，还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小说家呢？至少，不会成为我眼中优秀的小说家。因为当一个人对世事和自己看的无比透彻以至于做任何事都不需要犹豫时，他已经不需要写小说了。

[南非]库切：《夏日》，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29.8元。

图2为库切

BOOKREVIEW 书评

汗淋淋走过这些词

特约撰稿人 凌越（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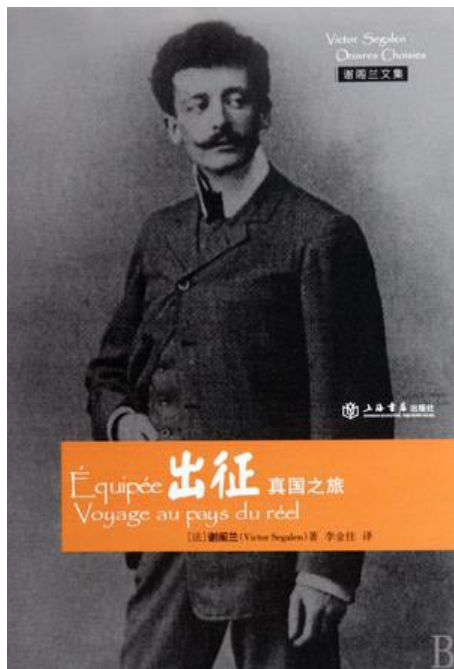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直至民国初年，众多外国传教士、学者、商人、官员，以及形形色色、身份迥异的探险家，纷纷进入中国广袤的西部从事探险考察。这些探险家一般会撰写两类著作，一类是有关地理、历史、考古等学科的考察报告，另一类是通俗的旨在面向大众读者的探险记实。作为稍晚在中国西部展开探险考察的法国学者，谢阁兰同样著有类似的这两种著作，学术著作是《中国西部考古记》和《中国，伟大的雕塑》，而记述历次考察活动经历的著作则是《路条》。但是和斯文·赫定、斯坦因这样典型的探险家不同，谢阁兰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因而和那些探险家主要的寻宝和测绘的目的不同，谢阁兰对自己中国之行的目的，一开始就了然于胸，在来华之初的旅行笔记《砖与瓦》中，谢阁兰写道：“《中国之魂》、《中国手册》、《三百页中国大全》——把这些书名带回欧洲，带回法国，让我们欣赏他们那可笑的概况吧！隐士的作风！小学教师的论文！我想我不属于这种人。问题不在于说出我对中国人的看法（其实我什么看法也没有），而在于说出我对他们的想象；不是可笑地模仿文献资料，而是要创作出超越一切现实的、活生生的、真正的艺术品。”在给朋友德彪西的信中，谢阁兰讲得更明确：“我来这里寻找的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幻象。”因此，和别的探险家相比，谢阁兰为自己的旅行多备了一双诗人的眼睛，《出征》、《碑》、《画》等著作则显然出自那双敏锐的诗人之眼。他对这些著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以至于考古考察倒像是他的副业，尽管这些考察本身也是高质量的，有许多重要贡献。



《碑》是一部以中国古代碑文的形式创作的独具特色的诗集，而《画》则是以描绘中国绘画的形式创作的诗集。两者都以大量的中国典故为创作素材，这些典故非常庞杂，谢阁兰在原书稿中又没有注明，后来的学者在考证这些典故的出处时恐怕是煞费苦心，而且对于这些典故的理解，谢阁兰也没有遵循固有的观念，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发挥：有的和典故固有的寓意相符；有的则对典故的原义加以否定，反其道而行之；有的则和典故原义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谢阁兰写作《碑》和《画》目的并在于对中国典故的考证和梳理，而是在于对他所追求的“中国幻象”的落实，而中国典故不过是刺激诗人诗思的一个外在的偶然缘由而已，它们和带给另一些诗人灵感的某个现实场景和事件并无本质不同。对于中国典故似是而非的理解无损于谢阁兰对内在真实的表达，无损于被解放的词语作为个体生命的生发和成长。《碑》和《画》的着力点都在于语言本身的优美和张力，在于语言本身意旨的丰富性，在这一点上，两部书都堪称杰出的诗集，谢阁兰所言的“中国幻象”其实就是语言本身的幻象。

《碑》和《画》可以说是谢阁兰所秉持的象征主义诗观的产物，对这种本身极其细微复杂的观念的思考则集中展现在《出征》一书中。这是理解谢阁兰全部文学著作的一把钥匙，一部谢氏文学理论著作，同时《出征》本身也极富文本魅力。在这本书中，谢阁兰将对文学的思考、现实的描述和诗意的表达溶为一炉，你甚至很难分清这是一部诗意的理论著作，还是一部以观念本身为素材的诗集，而且其间还夹杂着大量对于旅行途中所见所闻的细致描述，但这些所见所闻在《出征》中不再承担在通常的游记中所承担的叙事功能，而是成为观念的载体。为了凸显这一转变，谢阁兰有意在《出征》中抹去了一般游记的指实功能，通篇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具体时间，更未指明某一次攀登某一次相遇发生在何时，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具体的地点让我们为这次“出征”勾勒出一条行进路线，哪怕是在最含糊的地图上。途中所遇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是以“传教士”或“姑娘”、“女人”这样抽象的指代称呼。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醒读者：不要蒙蔽于旅

行。如此，所有和旅行相关的表述，才有可能回到他们原本更抽象的意旨上：“出发”不是从某地到某地的旅行，而可能是指在思想或者哲学里的启动，“攀登”不再是服务于某个具体的山峰，而是“感觉着每一步上被掂量、抛掷、赢得的身体的重量”。为了颠覆习见的游记观察视角，谢阁兰有意将观察的焦距调得更近或更远，其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陌生感，并试图将这种陌生感带入观念的讨论，从而将通常躲藏在思维丛林里的观念突然推至读者面前，让人触目惊心，仿佛观念长出了人们可以触摸到的艳丽脸庞和柔软腰肢，带着活生生的气息改变着人们的陈规陋见。最终，这次从现实出发的“出征”终于和作者脑海中勤奋地行进着的精神旅程相交会相重叠，成为本质上的文学之旅。



在《出征》的头两节，谢阁兰亮出全书的主旨：这次出征的目的“不在于把我带到目的地，而是不断地使争执爆发出来，这热而深的怀疑、第二次地、这样呈现：当你把想象对质于真实，它是会衰退还是会加强？”谢阁兰打算将原本寓意丰富的旅行的各个环节作为他研究各种文学基本问题的介质，这些问题包括：文学（想象）与现实的关系，词语的伟力和脆弱并置的吊诡，形式的短暂和永恒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很自然显现出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对谢阁兰的重要影响。象征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唤醒了对语言的敏锐知觉——语言不再被当作人的附庸，而是一种具有自己的法则和特殊生命的某种自足的物质。象征主义的精神领袖马拉美在其著名的文章《诗的危机》中，最早对词语的自决提出呼吁：“在纯粹的著作中，

诗人的陈述消失，并通过被调动起来的不均等的碰撞，把创造让给词语，它们就像宝石上的一条潜在的光尾用闪光的彼此照亮，取代具有古老抒情气息的可感知的呼吸，或者是句子的热情洋溢的个人倾向。”这段话是现代诗歌史上强调词语和形式重要性的诗歌运动最早的精神源泉，当然，谢阁兰并没有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马拉美的论断，而是以马拉美的这段论述为起点，探求词语与“句子的热情洋溢的个人倾向”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出征》则把谢阁兰的这方面思考推向极致。

如果说马拉美奠定了谢阁兰文学观的基础的话，另一个象征主义天才诗人兰波则显然是谢阁兰在情感上最热爱的诗人。谢阁兰最早的漂泊是作为法国海军医生到了南太平洋上的法属塔希提岛，1904年9月，谢阁兰离开塔希提，取道亚丁湾回法国，在非洲他一直待到1905年2月。在此期间，谢阁兰开始以新闻记者般的热情找寻兰波生前的足迹，他访问了曾经与兰波经常交往的里加兄弟，回到法国后又去拜访了伊莎贝尔·兰波（兰波妹妹）夫妇，并撰写了《两个兰波》一文，文中对兰波充满景仰之情：“阿蒂尔·兰波，15岁时成为无可争议的诗人。”兰波浪迹天涯的生活方式，以及绚丽缤纷有时又像恶魔的咒语般的诗歌都引起谢阁兰的强烈共鸣。虽然兰波徒步世界的热情，谢阁兰难以匹敌，但事实上谢阁兰比兰波走得更远，甚至兰波只是动过念头想要寻访的中国，谢阁兰不仅抵达，且盘桓逗留了数年之久。某种意义上他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那似乎看不到尽头的道路“将在沼泽里染上泥泞，从河滩上涉水而过，或者在穿过巨岩时干涸”。在诗艺上，兰波的名作《醉舟》给予谢阁兰强烈冲击，他惊叹于兰波在从未见过海的情形下居然能写出这么精彩的关于海的杰作。以此为契机，谢阁兰开始思考缠绕他后半生的诗学基本问题：诗歌、文字与现实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这个问题直到多年后谢阁兰以中国经验写作《出征》时，才得到美妙又无几分晦涩的阐释。

《出征》的核心议题是词与物、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在马拉美看来，词与想象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而谢阁兰的持论要谨慎许多，认为“这两个世界（指想象与现实）轮流将唯一的存在据为己有”。他最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世界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或者说是想象与现实之间某种潜在的竞争关系。从根本上讲，词与物的争斗发生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而每一个敏感的作家也一定会在写作的某个瞬间体会到词与物、词与现实世界之间某种恍惚的对应与抽离。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玛格丽特的名作《这不是烟斗》所阐发的正是这普遍存在的想象与现实的对立关系，他在画布上画下一个普通的烟斗的形状，然后将这幅画命名为《这不是烟斗》，这是一句不能再直白的大实话，但对于“艺术反映现实”这一古老信念却是当头一棒。同样，对纸页上一串串文字最准确的定义只能是语言符号，它们只是基于人们在特定时空下的共同约定才勉强指代着现实中的某物，它对于现实的描摹越“真实”，也就意味着它所暗藏的“谎言”越具有蛊惑性，如此追求真实本身只能是建筑在沙地上的幻影。可是反过来，这些抽象的语言符号也绝不会在庞然的现实物体的挤压下束手就擒，它们耐心建构的语言的海市蜃楼和现实景物混杂在一起，倒是有取而代之的趋势，正是在此意义上，王尔德“生活模仿艺术”才成为被人们广泛引证的名言，以揭示精神世界对于物质现实强有力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作家们与其追逐泥鳅般难以捕捉的“现实”，倒不如直接跨过“现实”去寻觅可以反过来左右现实的作用力，对于作家这种努力也许要更低调也更诚实一些。在谢阁兰那里，这种作用力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中国幻象。

谢阁兰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局限在旅行这一局部的空间和事件上，仍然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因为“旅行的情状与描摹，比任何别的由头，都更能引发这场迅猛、蛮横、冷酷无情的肉搏战，并让每一击都打到痛处。”也就是说，外在现实的新奇和残酷（这都是一般的旅行容易获得的印象）可以强化它和词语之间内在的竞争，更容易将这隐藏在词语内部的争斗浮现在直观的现实层面，如此，我们对这争斗的观察也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从这种考量中，我们亦可看出，对于现实本身的力量，谢阁兰也从未小觑过。每当谢阁兰想重申自己对“粗鄙的现实”的蔑视和对文学、想象的信念时，他又对这种外在的等级划分的根据抱有怀疑。所以，当谢



阁兰在第九节中通过对于河水的描述——“顺流而下，那便是置身于一种慵懒、细腻而又转瞬即逝的魅境之中”——得出“真实与想象不再对立，而是归于和谐”时，并不会让人觉得意外，甚至于在某些段落里，倒是真实被看重，想象遭贬低。对于在这两个世界中的犹豫和不断转向，体现着谢阁兰在现实与想象的两分法的框架中所感到的不适。这种不适归根结底似乎又得归咎于语言本身，因为它分化着、对立着、印证着人与世界的隔离。从纯粹的理性思辨，谢阁兰得出自己倾向于词与想象的形式主义文学信念，可是人对于物的永恒乡愁，一种有如大地般普遍又深沉的情感，则伴随在这思辨的每一道皱褶和罅隙里，使得诗人仍旧热烈渴望着词与世界的最终和解，而思辨的正确与错误也就变得不再重要。

《出征》里所有言之凿凿的观念，都被它自身携带的反诘弱化，甚至走向这些观念的反面。这大概也是人的理性命定的局限性的体现。所有敏感的诗人其实都明白：思辨的目的其实不在于获得一个一劳永逸的正确结论（那并不存在），而是在于思辨过程本身所带来的斑驳印记，所谓的真理则在这印记间倏忽闪过，

并留下它最称心的载体——诗。在《出征》中，不管涉及的章节是在述说着旅行途中怎样的环节，其实本质上都是谢阁兰试图将词语置放于现实的显影液中，去观察其中最细微的往往被人们称作“美”的变化。谢阁兰在书中曾写道：“我说过、感觉过、汗淋淋走过这些词……”这些词语一方面被汗水洗净它在被简单用作交流工具时所沾染的大量灰尘，变得愈发清晰又陌生；另一方面，所谓现实也被这簇新的词语所照耀，生发出神秘的物质之光。的确，词和物之间良性的互动，可以使它们一起上升到洁净的高空，在那里词和物最终得以拥抱在洗涤心灵的永恒的颤栗之中。

[法]谢阁兰：《出征》，李金佳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6月，22元。

图3为谢阁兰于1914年拍摄的陕西。

BOOKREVIEW 书评

迟到的《帝国》评论

特约撰稿人吴强（北京，qiangwu.de@googlemail.com）

大约在千禧年或者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前后，后冷战的气氛一度达到高潮，一个新帝国的政治景象呼之欲出。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年出版的《帝国》（Empire）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快被译成多个版本，也包括中文版，在国际学界颇有影响。不过，在当时“新保守主义”话语几乎垄断有关帝国的讨论风气下，这本左派风格的《帝国》在中国学界的反响似乎相当有限，仿佛学界这个大酱缸已经僵厚得很、自信得很，流星坠地也不过瞬间之事。类似命运的还有差不多同时引进的卡斯特（Castells）的《信息年代》三卷本，自由派对之不以为然，而所谓“新左”们则似乎从中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不约而同地闭口不谈。

究其原因，大概既有对分析方法和路数的陌生，也有国内左、右两边阵营其结论的担心。方法上，如此书的合作者——来自北美的比较文学教授哈特，与比他年长的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采取了一种欧美混合的路数，而且是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的新结构主义与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结合，以此逻辑来解释全球化时代“没有政府的统治”。这样一种全球秩序的“帝国”，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帝国形态，因为它“既是网络系统，又具有等级结构”，而且有着“能够导向新秩序的合法动力”，也就是全球民主。

虽然哈特和奈格里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帝国》否定了美国可能或不可能继续扮演的帝国角色，并且让我们看到了一条全球民主的另类道路：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吉登斯最近在他的气候政治中提出的全球政府、或者以全球政府、全球新政所代表的全球民主，而代表着反全球化运动对全球现有秩序的彻底颠覆，毋宁说是全球的无政府主义。比如最近一年来尤其最近一个月来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的维基泄密门，从外交机密到内部秘密，形形色色的机密或非机密文件犹如一幅巨大的拼图，维基泄密正在为全球公众一点点展现所谓国家机密、所谓外交行为、所谓国家利益、所谓国家安全的本来面目：那就是大量琐碎如八卦一般的国家间的阴谋和抱怨，既有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刑，也有他们在阿富汗战场的困境，还有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真实态度，甚至围绕朝鲜半岛的种种有趣情报。他们所挑战的，并不是情报圈或者外交圈早已多少耳闻的大量低密级文件所透出的阴谋与八卦，而是力图改变全球公民社会对所谓政府、所谓真相的共识。



这恐怕才是现有的民族国家的末日秩序所真正害怕的梦魇。

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实则无政府主义的帝国图景，近乎一种新世界主义的革命前夜。因为，哈特和奈格里一方面指出了大众反抗帝国的新的可能，就是在全球化之下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他们将欧洲观念视为美国模式之外、或者对欧洲衰落自身的超越危机的方式，也就是本体论的替换，一种新的帝国范式，无法为那些陈旧的理论所理解。然后，十年前，哈特和奈格里向北美新保守主义的帝国幻觉和那些在国际左派共同体内标榜地方主义万岁、而实为死硬民族主义分子的伪“新左派”提前开火了。

然而，理解如此带有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帝国论，需要结合两位通常被看作政治上保守、偏右的思想家，也是《帝国》的理论基础：卢曼主义的社会系统观和福柯的身体政治（biopolitics，学界也译为生命政治，书中译作生态政治）。表面上，他们的理论全无批判色彩，只是分析和洞察、洞察和解释，却藉此才能领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也是帝国的生命政治基础，即规训的治理性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帝国意义，然后才可能真正了解反抗的可能。也许，这一由后现代主义建构起来的理论在方法上的实证主义和结论上的普世性很为“新左”们不喜，其中的“帝国—反抗”二律背反又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说，在规训时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破坏，对立意味着直接对抗的或者辩证的力量，如萨特在 1960 革命年代的辩证法；而在帝国控制的年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离弃，对立在倾斜的或者对角的位置展开，没有固定的发生场所，而是反抗与威权之间的相互穿透，在一切权力的场所疏散、清空（哈特和奈格里，2008：208）。这或许是福柯从规训（Discipline）到治格（Governmentality）的进路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治格在今天以全球化的形式重新获得统治并不意味着反抗的消解，比如全球治理的盛行，相反，却昭示着另一条抗争的道路，从全球化的内部、核心展开的全球民主化运动。或者说，反抗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时代的颠覆，而是迫使或者诱使权力清场，从虚空开始创造一个新的公共空间，以呈现“非分之分”与权力结构的紧张，进而占领之。这是齐泽克所说的减法政治，世界左派的最后抵抗，也是法国理论社会学家朗西埃所说的政治的本义，比如反全球化运动分子在西雅图街头静坐，乌克兰民众在基辅街头发动的橘色革命，泰国红衫军占领曼谷闹市盘踞不去，等等。

只是，与这场运动相对的，一个超国家中心的帝国兴起的同时，“具有高效机制的地方反制力量网络却会兴起，去抗争并支持新的权力体”。我所理解的这一地方反制力量，既指属于全球公民社会运动一部分的地方抗争，更经常地却是那些民族国家躯壳的顽固卫道士们，他们同时被新兴的帝国和反帝国的人民力量所夹击，却轮流客串着人民的民族守护者和帝国的同盟这双重角色，并且时刻觊觎着帝国的版图。

南美、东南亚过去一个多世纪抗争民主的发展历程，或许便是这一新帝国范式生成和帝国觊觎者的最好

例证。比如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和新社会运动都能在东南亚的同时代抗争运动中发现对应，还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民族主义运动和佛教改革运动。尤其是，从菲律宾人民力量的兴起到从马来西亚人权运动高涨，从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倒台到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从缅甸的番红花革命到泰国的红衫军示威，东南亚地区的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正在形成一股新的民主抗争力量，开始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版图，成为推动该地区民主转型的主要动力。只是，这一新的结构性政治变化远未为公众所了解，他们往往被媒体对每一次最新抗争事件的报道所吸引，却容易在这些“间断性爆发”的间隔中遗忘上一次，遗忘古早的反抗。

但是互联网时代、反全球化时代，真正的抵抗莫过于世界无政府主义的兴起——这只幽灵在互联网时代和全球社会运动时代的复活。发端于 19 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曾经在 19 世纪与马克思论战，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班牙与共产主义者并肩战斗，在 1968 的世界革命风潮中再度兴起。虽然始终难以逃脱被冷战、被全球化潮流边缘化的境地，却终于在 1990 年代以来的赛博空间和全球社运中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位置、网络和影响，比如活跃在几乎每一次 G8、G20



峰会、各种联合国会议外场、身穿黑衫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ATTAC，正是他们构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行动核心，为世人所知。

现在我们知道，在几乎成为全球政府公敌的维基泄密的创始人朱立安·安萨奇的背后，是计算机黑客、中国异议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一些颇有雄心的私人基金，还有无数正在集合的愿意分享这个世界真相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雇员、新闻记者、黑客和普通公民。他们在做的，如维基泄密的另一位创始人来自德国的丹尼尔·施密特对母亲经营着澳大利亚一家木偶剧团的安萨奇的评价：“他是少有的一些个真正想通过宁愿冒犯错的风险也要采取激烈行动来切实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之一”。每个世界公民都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来改变这一世界，那就是分享真相，然后挑战所有的政府和那些不希望真相暴露于世间的威权。这样的战斗让人想起 1930 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曾经代表着世界无政府主义者针对世界霸权秩序的一次反抗高潮。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笔下，全球化的帝国似乎正在重新陷入西班牙内战的泥潭，一次全球无政府主义的大团结正在到来。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005、2008 年，21、31、32 元。

图 1、2 分别为《帝国》2003 年、2008 年中文版。

BOOKREVIEW 书评

都是“人民”惹的祸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为什么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只有中日关系习惯上被称为“中日友好”？致力于中日外交则被称为“从事中日友好工作”？（如唐家璇便自称为“一个多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老外交官”。见《劲风煦雨》，唐家璇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第 26 页。）进而，在检讨战后中日关系史的时候，常常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两国关系一旦遭遇挫折，出现倒退，动辄便一退到底？所谓“人民外交”的“滚雪球”式积累，到底有多大的现实性，还管不管用……对所有这些问题，刘建平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以下简称“刘著”）一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而且，沿着这个方向，做了相当深入的开掘。从学术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开拓性的。



比较中日两国对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叙事会发现，相对于日本强调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矛盾、美国的世界战略及东西方冷战体制对中日关系制约作用的“美国冷战政策约束论”或“冷战体制决定论”，中国往往以“民间贸易——半官半民——邦交正常化”的发展图式来图解所谓“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发展过程，从而正面评价“人民外交”的重要推动作用——即“人民外交决定论”。尽管这种基于朴素唯物论的量变—质变观可以部分模拟发生过程，但却无法还原整个过程，尤其对一些关键性“节点”和倒退现象的解释上，屡屡呈现无力感：譬如，为什么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在 1972 年 9 月，而不是更早或更晚？为什么在邦

交正常化已逾 30 年，按说“人民外交”的积累已然高度雄厚的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倒退？盖此“人民”不复彼“人民”乎？

众所周知，对待日本及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中方历来强调“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即把全体日本人二分为“一小撮”和“广大”两个子集的所谓“区分论”始终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可以对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某种“万金油”般便利的解释，诸如建国后至 70 年代初期，邦交正常化之所以无法实现，是“一小撮”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右翼保守政治势力长期阻挠的结果；诸如中国之所以在邦交谈判之初，便确立了“放弃战争赔偿”的方针，是出于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和体量，考虑到“不给日本人民增添负担”，等等。这种解释便利则便利矣，但时常呈现出逻辑上的张力，甚至矛盾，往往经不起推敲，而随着历史文档的解密，则破绽百出。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以为，“人民外交”是建国后确立的对日外交方针，其实不然。作为一种指导对日外交工作的“外交哲学”或意识形态，可追溯到延安时期中共的日本研究体制和旨在对敌（主要对象是日军战俘）策反的日本人反战运动，而这两项工作，都与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密切相关：野坂参三（Sanzo Nosaka）。

野坂参三（笔名林哲、冈野进），1892 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萩市，毕业于庆应大学；1920 年在英国加入英共，1922 年回国，参与创建日共，后任日共中央委员；1931 年，亡命苏联，同时接受日共中央派遣，作为日共代表出任共产国际执委；1940 年春，秘密来到延安，与中共合作，组建日本人反战同盟，开展反战运动。由于野坂其人具有日共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的双重身份，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同时又是不可多得的理论家，其“加盟”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据野坂本人回忆，自己在延安得到与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同等的生活待遇。受周恩来、王稼祥的委托，野坂在既有的日本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全面接管并主持重建了中共的日本研究，涉及日本问题的方方面面，培养了一批后成为对日外交精英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野坂创办的《解放日报》“敌情”副刊（半月刊），是毛泽东的必读材料。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毛与野坂常常碰头，甚至让野坂住进自家所在的果园的一处住所，几乎每天都见面。在中共七大筹备期间，毛特别指名把会议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修改稿呈送野坂，征求意见。七大大开幕式上，毛致开幕辞，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讲完话之后，野坂代表日共致辞；会议期间，在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报告之后，野坂作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讲演，后讲稿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与主要领导人的规格完全一样。

刘著认为，“野坂参三帮助中共开创了正式的日本研究，而且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日本知识和日本观的来源。”对野坂在延安领导的日本人反战运动，正如中共领导人所称“是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的起点”那样，事实上，“中日两党（指中共和日共——笔者注）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直接合作关系创造了‘中日人民友好’这一战后中国对日外交思想的历史原点”。它不仅包含特定的历史内涵，而且有基于国际正义的道德前提。由此，刘著推导出所谓“日本人民”的定义：“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日本国民，它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概念，其政治内涵就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因此，‘日本人民’在战前就是以共产党为先锋的反战民主力量，在战后就是受到以日共为代表的反战民主势力影响而坚持严肃清算战争罪行、诚恳反省罪恶历史、自觉承担战争责任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和平友好外交的那一部分日本国民。”正是在“日本人民”的学理概念基础上，中共试图建构所谓“中日人民友好”的逸出普通国际关系学框架的超越性逻辑，并在建国后不久即付诸实施，正式展开了通过“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漫长操练。为此，从协助滞留大陆的日侨归国，到达成两国“人民间”贸易协定，虽然做了一些



互利互惠的双赢性奠基工作，但距邦交正常化的战略目标，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

应该指出，按上述“日本人民”的定义，其正统、有效的组织载体非日共莫属。但由于战后美日统治当局出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和保守化的国内政治需要而展开的“赤色整肃”(Red Purge)，加上日共在苏共和中共遥控（主要是前者）下所采取的热衷于暴力革命的过激路线及残酷的内斗，在战后初期便过早边缘化，1951年的党员人数萎缩至1949年的几分之一；翌年10月的大选惨败，连一个席位都未能获得。尽管50年代中期，流亡北京的领导人回国，经过整顿和改组，摒弃了唯暴力革命论思维，多少挽回了一些名誉和损失，但在日本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国会议席长期徘徊在两三个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日益蜕变成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化想象，代之以奉行议会政治的民主主义国家中时而激进、时而保守，虽然立场摇摆不定，但在关涉国家利益的选项上却与保守政治大致同调的“日本国民”。两者之间有交集，但并不重合，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被中国误认为是‘日本人民’的一部分日本国民，可以接受中国的‘人民外交’利益，却不可能在符合中国利益期望的方向上‘以民促官’”。

也因此，日本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形势和美国庇护下“桥头堡”的有利地形及大陆、台湾“分而治之”的现实矛盾，从《旧金山和约》到“日华和约”，直到《中日联合声明》，不仅以最快的速度复归国际社会，而且在中、台之间精确游走，先于台湾“前戏”，后跟大陆“真练”，在“真练”的同时，却不伤前者的和气；一会是法律解决，一会是政治解决，而无论何种解决，均能确保自身“国益”的最大化；从台湾问题，到战争赔偿，到领土纷争，日本始终没失去什么，诚可谓左右逢源，占尽先机。

随着日、美、苏（俄）等国历史文档的解密，当我们了解到有些历史事实并非像党报社论和历史教科书所宣称的那样的时候，内心的挫败感怎一个失落了得：譬如，1972年7月，始终被中方当成“田中密使”、“和式基辛格”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携日本政府的谈判条件来北京秘密交涉，获周恩来的接见，亲耳聆听并记录了中方关于建交联合声明的草案，而其中所谓“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核心条款，实际上成了后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前提条件（即表明，战争赔偿问题是不容谈判的）。后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的1977年，竹入其人才首次对新闻界披露了自己假扮特使，以私撰的政府谈判条件访华，取得了中方的建交谈判草案后，才作为“礼物”向田中角荣首相和时任外相的大平正芳报告的访华“秘辛”。

而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令人备感历史的无情嘲弄和所谓“人民”论之虚妄的了：1992年，解体后的苏联公开了一份解密档案，指证日共早期卓越领导人、职业革命家、中共“人民外交”论的始作俑者野坂参三于半个多世纪前在莫斯科诬告当时同滞留苏联的山本悬藏等日共同志，导致山本在肃反运动中被斯大林冤杀。（见《旧闻记者》，钱钢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第81页。）是年，日共召开中央委员会总会，宣布开除时年整百岁的野坂的党籍。对此，野坂未发一言。次年，撒手人寰。

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49元。

图1为野坂参三。

BOOKREVIEW 书评

伊利札洛夫同志归国记

特约撰稿人 贾葭（北京，jiajia80@gmail.com）

杭州南山路的傲影桥畔，有一幢暗黄色的西式小楼，门口店招上写“澄庐咖啡”。在二楼的大阳台上，孤山、白堤尽入眼底，湖光山色一览无余。这幢建筑系民国期间的实业巨子盛恩颐 1928 年在杭州兴建之别业。

此公系盛宣怀四子，其伯仲叔皆早夭，极受盛氏宠爱，“恩



颐”二字是西太后所取。据说上海第一辆进口的奔驰轿车就是他的，租界牌号为 4444，上海市牌照为 4，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盛家老四来了。还有，他的小姨子孙用蕃，是张爱玲的后母。

这幢楼修起来没几年，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在钱塘的别馆。1937 年的 4 月下旬，蒋中正在此处小憩。其间，他召见了那个已经不再认他做父亲的儿子蒋经国，后者刚刚从苏联归来。蒋经国去国 12 年，父子之间鲜通音讯。不仅如此，经国还两度公开表示，蒋介石是叛贼，是中国革命的罪人。

这是一次特殊而重要的见面。陶涵教授的《蒋经国传》说，经国见到父亲，即双膝跪地三叩首。违背了传统尊父之道的经国，并未主动向父亲请罪，但父亲似乎也原谅了他，且从未提及此事。此前几天，经国在南京拜访陈立夫，陈说，你要向令尊报告，你已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

以这次会面为限，此前在苏联的 12 年，他称得上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此后的 12 年，则是他日渐绝弃共产信仰、靠近三民主义的 12 年。究其原因，既有父子之亲，又有家国之痛。从本书看，经国迟至播迁台湾前，才完全看透共产主义对中国之影响。

少年的蒋经国，在上海跟随只长他四岁的上海姆妈陈洁如读书。蒋中正此刻尚在广州，要经国每周写两三百字的信给自己。蒋还建议儿子把去函保存，时刻温习。蒋中正给儿子开出的书单是：四书、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文集、三民主义。蒋亲做批示，把自己读过的书寄给儿子。这是少年经国的思想发轫期。

当时的中国正是“西北望俄京”的时候。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样本。孙中山试图让苏共协助国民党，完成中国革命的反帝任务。1923 年 9 月，蒋中正率考察团赴苏联访问。从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甚至要强制性的要求自己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这本书，他在苏联期间，至少看过五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则至少一遍。



蒋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分为两部分，政治经济学部分“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9月23日），社会发展史部分，“则倦不掩卷”（9月24日）。复习第三遍后，总体的感觉是“尚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10月10日）10月30日又记：“看马克思学说上半部，颇欲厌去，至下半部，则生玄悟而不忍释卷矣。”

彼时，恐怕刚刚成立的中共，都未必能得到这么全的资料。蒋在参观之时，对苏联共青团、政工干部的做法极为夸扬，说“这是最好的政策”。但他与苏方的分歧在于，后者认为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与苏维埃军委副主席斯克良斯基讨论军事问题时，后者劝蒋跟工农亲近，暂时不要发展军事力量。

蒋介石表示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必须先廓清北方军阀。杨天石曾认为，蒋介石认定这是俄国人力图控制蒙古、侵略中国的表现，因此，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持怀疑态度（见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不论如何，苏俄还是第一个愿意在较大规模上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对孙而言，俄国人的路似乎是一条坦途。蒋中正在俄京访问时，共产国际派来新顾问鲍罗廷，正在广州撰写国民党新党纲和宣言的草稿。1924年1月，党务改造案出台，国民党开始大左转。6月间，保守派倡议中央清党，驱逐共产党员。蒋6月29日在黄埔公开演讲，赞扬苏共，“俄国共产党党员乐意为国家、百姓工作，不只为个人利益做事。”

在亲苏之问题上，即便蒋之内心有怀疑，但在行动上紧跟孙中山。这种态度对其子有无影响，无法得知。次年的五卅事件中，经国曾四次出来领导群众活动。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亲苏派汪精卫获选为主席。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告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

该年夏天，该校还在预备中，苏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就开始联合选拔第一届学生。经国两次找到党国元老吴稚晖，要求吴推荐他去中山大学。蒋立即斥责儿子“朽木不可雕也”，还说负担不起学费。但1925年10月1日蒋在日记写，“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短短两个月，蒋的态度就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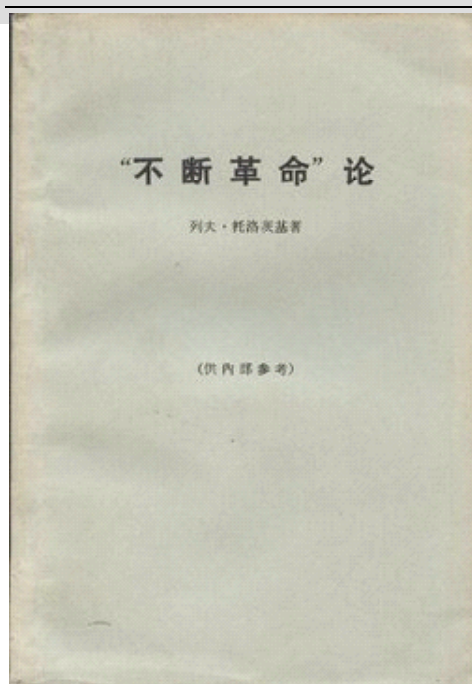
最积极反共的陈果夫，不仅没有警告，还替经国准备过冬的保暖衣物。1996年陈立夫接受陶涵采访时说，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这样看来，蒋中等的变化，也符合他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利益。蒋建议儿子，在出国之前，先加入国民党。10月底，经国赴苏。



中国革命成功，就能够成为苏联抵挡英国和日本的缓冲地带，这是斯大林的算盘。中共羽翼尚不丰满，与左倾的国民党联合，当然是个办法。但国民党不能化解这种内部冲突。1925年末，西山会议派要求分共，蒋介石在《政治周报》第4期发表《为西山会议告同志》，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本无冲突。有趣的是，这篇文章的编辑是毛泽东。

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分化，也影响到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1926年秋天，经国在中山大学中文期刊上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抨击中共阻碍革命事业，在国民党内部散播纠纷的种子，集结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反抗国民党部队。他指控中国共产党进行渗透活动，扩大控制地区，并建立自己的武力。

这种态度可能与蒋经国对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认可有关。托洛斯基作为列宁主义的集大成者、红军总司令，威望极高。经国的导师拉狄克跟托洛斯基关系很近。也许是出自对中国革命核心力量的支持和对国民革命的热忱，他到苏联不久就成为托洛斯基的追随者。甚至有人说经国是托派的组织者。



当时斯大林已经不能容忍托洛斯基对他地位的威胁。10月，托洛斯基被赶出苏共政治局。官方谴责托洛斯基及其追随者是社会民主党偏离分子。而中山大学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拉狄克以及若干老师，依然赞同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而托洛斯基与斯大林的矛盾，又岂是这些年轻学生所能懂得。

在苏联的武器援助下，北伐比较顺利。1926年8月攻下长沙之后，蒋说“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俄以推翻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蒋经国认为，他心目中的父亲，不但是列宁的信徒，甚至是托洛斯基的信徒。拉狄克就经常说，蒋介石是不断革命的表率，苏联的官方刊物都在赞颂蒋中正。

让经国始料未及的是，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托洛斯基首先表示，中共要和国民党右派及蒋决裂，同时他建议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要掌握武汉政权。经国心仪的托洛斯基和拉狄克，成为自己父亲的政敌。是老师错了，还是父亲错了？这对他来说，恐怕很难理解。当时，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希望进军北京，而蒋则坚决要先取上海。托洛斯基也许认为，取得上海之后，因之雄厚的财源，蒋以后未必会事事参考莫斯科的意见。

斯大林和官方媒体依然替蒋介石的军队辩护。占领上海的消息传来，莫斯科一片兴奋。人们在共产国际总部门前聚会，而经国则站在队伍的最前列。4月开始准备群众的红场游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肖像已经准备好。

这一切都因为“四一二”而改变了。尼古拉·伊利札洛夫（经国的俄文名）同志在中山大学发言，“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打倒叛贼！”苏联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4月21日发表题为《父与子》的文章，摘录经国给父亲的公开信：“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布哈林的态度要务实一些，支持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控制武汉政府，联合对抗蒋介石。托洛斯基则主张苏联应该与国民党各个派系全面决裂，在中国各地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蒋经国是托洛斯基的支持者，不仅写文章表示支持，甚至去拜会托洛斯基，但是他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布好了针对托派的一系列行动。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向经国表明，他必须放弃亲托洛斯基的活动和信仰。

“四一二”之后，国民党中央饬令国民党籍学生离开中山大学回国，239个人听从命令。留下来的320个学生中，有50名是国民党员。这其中不仅有蒋经国，还有冯玉祥的子女——冯弗能与冯洪国。

中共于是依照斯大林的意见，在各地举行暴动，这就是后来被中共称为“南昌起义、鄂南起义、秋收起义、海陆丰起义、广州起义”的一系列对抗。广州暴动中，苏联领事馆甚至直接参与担当军事顾问，领馆的车挂着红旗游街，两天后就被镇压，多名苏联外交人员曝尸广州街头（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

1927年秋天，经国到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习，他是军事学导师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十月革命10周年的游行中，中山大学亲托洛斯基的师生，亮出托派的标语，高呼反斯大林的口号，被官方平息。1928年1月，托洛斯基即被流放至土耳其。经国在此时在学院签署正式声明，放弃托派思想。他说，“遵照军校同僚的劝告，我终止与这个团体秘密活动的关系。”

在军政学院里，经国事事积极，表现出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遵从态度。他还发表诠释唯物辩证法法文的文章，加入共青团。但共产国际对他并不放心。江浙同乡邀请他做同乡会长，竟遭到王明的调查。夏天，经国成为苏共候补党员。此时，苏联全国正在忙于消灭富农阶级。经国在日记里，对下层的工农极为关心，事无巨细地记下他的行程和感想。

经国在1930年5月毕业，10月，调职至迪纳摩电厂。有次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的一次会议中批评王明，共产国际逼他离开莫斯科。他向苏共申诉，才得以留下。此时，他已成为斯大林跟蒋介石角力的一

颗棋子。

1931年12月，国民党抓获一个叫牛兰的波兰人。此人奉共产国际之命在上海指挥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支部。孙夫人提议，以牛兰夫妇换取经国回国，为蒋中正所拒。他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说，“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这天，他刚刚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溪口。陶氏评论说，“蒋氏关切儿子安危，也与他决定下野有强烈关联。”

1932年10月，王明回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正是掌控经国的机关，王明拟让经国去西伯利亚工作。同时苏共领导也告诉经国：我们是希望你留在莫斯科，可是你和中共代表不和，最好还是离开。经国在这个时期，已经确认中共和苏共是同路人，而父亲并不是。寄人篱下的他不但要反对中共、而且要认可遵从苏共，委实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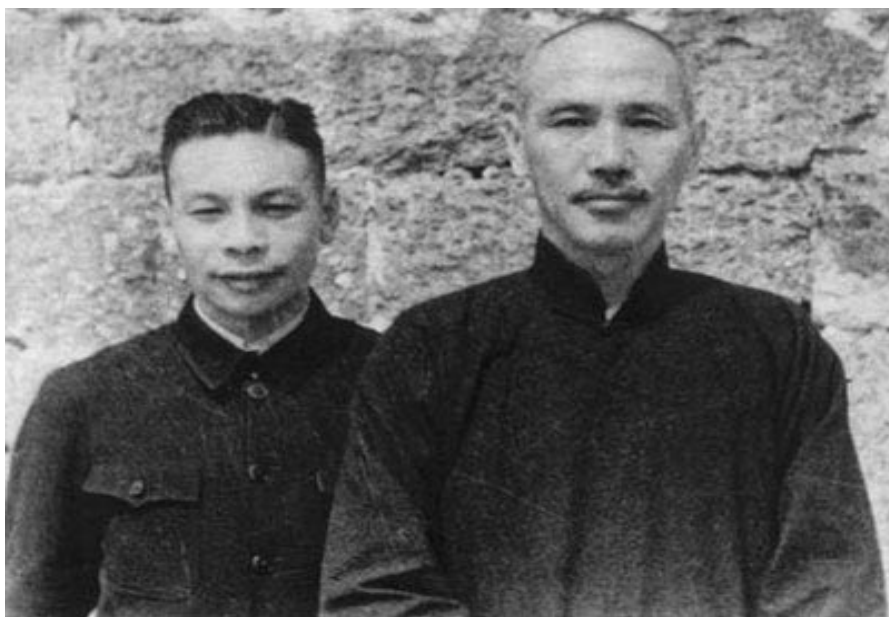
1934年8月，经国被委任为乌拉尔马许工厂的《重工业日报》副主编。国家安全部对他说，中国政府希望他回国，但是他应该写信给外交部，表明不愿意回国。随后，《真理报》刊出蒋经国写给毛福梅的信，说父亲是“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这封信出自王明之手，王写好之后，让经国签字。经国再三拒绝，最后还是签了。

次日经国去见安全部的首脑雅戈达，提出让王明销毁信件。经国自己写了一封信，内中提到，“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婉转表达了要回国的意思。但《真理报》还是发表了王明的那个版本。从这一行为来看，经国已经对苏共及中共对他的限制表示了些许不满。

1936年夏天，他的导师拉狄克认错入狱。蒋经国认识的干部几乎全部遭到清洗。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11月16日，蒋经国申请正式加入苏共。西安事变后，蒋经国回国成为可能。12月14日，共产国际得知乌拉尔马许党委即将批准蒋成为党员，立即要求经国回莫斯科。12月16日，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担保蒋经国可以回来。情势变得明朗起来。

1937年2月，经国在莫斯科的告别茶会上说，“中央派我到中国，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随后，他还与斯大林见面，讨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此时共产国际和苏共对蒋介石的评价又变了，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盛赞蒋介石深明大义。

到了海参崴，陪同他回国的康生，与他联合给中共莫斯科党部发电：“现在，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请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守党纪……我们由苏联海滨向各位共产同志最热忱的问候。”这是他最后一次听从共产党的命令。



经国与父亲见面前，拜会了吴稚晖。经由吴转达，蒋中正才同意召见。蒋显然对这个共产党员儿子很不放心。5月12日给经国写信，要求他重读三民主义与孙文学说。信中说，“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即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不仅如此，还派了徐道邻与经国在溪口同住，用意颇为明显。

蒋还要求儿子继续读曾文正、胡林翼的书。也许他觉得这十二年间经国在苏联的思想意识已经完全赤化，亟须纠正。经国似乎也愿意向父亲表现出自己进步的一面，在去信中大谈自己对传统文化、三民主义的认识。一个月后的6月16日，蒋在日记里评价经国，“文字思想皆有进步。”

但他的行为依然难以完全摒弃共产党作风。次年春天，经国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他雷厉风行

地处死逃兵，遭到熊式辉投诉，说他作风像共产党。蒋介石也接到类似的投诉。忠义救国军负责人文强，受戴笠之托，每个月跟蒋国见面一次。文强向他解释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现状。而经国则用“大资产阶级”这样的词称呼孔祥熙和宋子文。这些谈话记录转呈戴笠，再转呈蒋。

皖南事变后，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减少。这年春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相松冈洋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经国才渐有反共情绪。他在《青年日报》上开始发表反共文章。此后，他在赣州整顿，颇受外界好评。他经常为人称赞的一点是，喜欢亲近工农大众，平易近人。这大约是他保留的唯一的“共产作风”了。

在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亲美态度，蒋经国已经不被苏联信任。因为东北问题，他在1945年圣诞节赴莫斯科，曾经两度拜会斯大林，寻求东北问题之解决。而莫洛托夫认为，这是两面派手法，“伪装他是苏联真心的朋友。”1946年2月22日，重庆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反苏游行。民众砸毁中共的报馆，冲进苏联使馆。经国曾力劝其不可。

经国本人，仍对苏联保有些微好感。他也会数度与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将军密谈，想促成蒋中正与斯大林之会面。4月18日，他还向魏德迈将军办公室要求，美国空军必须放弃南京一个招待所，供苏联大使馆使用。还有人说，他在上海整顿经济期间，还曾阅读过《列宁全集》。他大脑的马列思维，似乎还无法完全去除。整顿经济有一个“打倒官僚资本”的口号，也是列宁式的。

经国从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到最后完全承继三民主义，用了12年时间。在与中共和苏联几度交手后，他本人的思想开始转向。在苏联目睹的大清洗以及延安整风，对他影响也很大。蒋介石、徐道邻、戴笠、文强等人的谈话，更不消说。更重要的是，战后他亲身处理的东北问题，让他得以完全看清楚苏共的实用主义路线。

中共部队南京渡江后的4月4日，经国在日记里写：共产党“一面倒”之附庸主义真面目，亦因此宣告而暴露无遗矣。4月27日又记，“其伪装和平之假面具业已揭穿，狡猾阴狠的原形完全暴露。”10月3日，苏联宣布与中共建交，经国评曰：“其外交阴谋及狰狞面目，业已全部暴露于世人之前。”

[美]陶涵：《蒋经国传》，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42元。

图1为澄庐；

图3为托洛斯基；

图5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合影。

FILM 影像

诗人总会返乡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xiayouzhi1997@gmail.com）

《一个半房间》是布罗茨基重回彼得堡的故事。父母死的时候，布罗茨基生活在纽约，没能和他们见面。这段旅程十分哀伤，尤其是他想象自己与父母谈论死亡的时候。

布罗茨基坐在桌边，问他的父亲：

那么，你是怎么死的？

当时我正在看电视,跟现在差不多,正在转播花样滑冰比赛,突然椅子“啪”地一声,我晃了一下,就这么死了。

你害怕吗?

一点都不怕。我整天想吃鸡,但没人会做,你妈妈已经……

你呢?他转向母亲。

我被查出有胃溃疡,他们送我去基斯洛茨克,有病都送去那里,结果不是胃溃疡。

她转向他:我生气的不是这个,那些钱是我存下来去看你的,我在火车站排队买票的时候,钱包被偷了。

他们在斯大林时代失去了财产、安全和尊严,生活在彼得堡的一个半房间里。建筑本身是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辉煌遗迹,西方化的俄罗斯精神传统的化石,隔成无数个隔间之后,成为苏维埃公民的集体宿舍。赫鲁晓夫时代的短暂开放让布罗茨基这一代俄国人接触到一种充满物质欲望的文化。这是被人为压制的人性需求的对应物。1959年,布罗茨基穿着紧绷的牛仔裤,和朋友专程从彼得堡去莫斯科,参观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带来的美国农业展,但《生活》杂志和百事可乐的气味唤起了相反的联想。和不可抵挡的消费文化的潮流相比,布罗茨基觉得,一种精致的和少数人掌握的西方艺术精神已经日薄西山,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关心文化的最后一代人”。

文化上的自负并不一定让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空虚和停滞不前的时代气息。布罗茨基讽刺这种让人沮丧的封闭和装腔作势,纯粹是性格使然,更少出于政治上的痛苦,更多源自文化上的自尊心。国家机器将他一再流放,先是在国内,然后遣送出国。这与其说是刑事法上的必要,不如说是一种政权的逃避:这种人的存在让党头疼、尴尬、无所适从,又不能驳倒他们;如同小矮人被公主的身高所震慑,为了自欺欺人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最好的办法是把公主赶走——或者不让她回来,然后,所有的人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庸人生活的悲剧,这不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大主题吗?

敷衍塞责的官僚维持着貌合神离的国家。父母一直申请去美国,好在死前能够再看到独子一眼,却被这个不可企及的过程折磨死了。一种“不合适”的气氛,把他们在各种办事机构之间推来搡去。无人负责,没有答案:这是庸人生活的另一种悲剧,当然有它的政治根源,尽管布罗茨基倾向于将之归结为一种民族性,归结为俄罗斯民族的道德缺陷:

这就是俄罗斯生活的悲剧。人与人之间没有相互尊重,只有蔑视和冷漠。

但有同样经历的人都知道,官僚制度特有的蔑视人性的作风,官僚机构办事人员特有的怯懦,多么眼熟。当然也是一种低级的报复。制度走向崩溃的时期,生活特别言不由衷,特别表里不一,目标和手段、口号和作为之间,充满了裂缝。卑琐的人性就在这些裂缝中生长,对试图超越现状的思想和行为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敌视。也许是一种嫉恨:很多人的生活将随体制一起被埋葬,他们自己看得很清楚,却无法摆脱,足够让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施展各种小小的折磨,延缓别人的快乐。

离开苏联的时候,布罗茨基带走了一把公寓的钥匙。苏联和列宁格勒都成为过去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圣彼得堡,发现此地已经如同他年轻时预感的那样,变成了一座美国式的城市。欣欣向荣,不顾一切地追求成功,把物质成就视为对历史和苏联制度的报复和补偿。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自家的一个半房间的房门,迎面而来的是布罗茨基一家的废墟。

历史进步无法抚平个人生活的惨痛经历,普遍和人为的悲剧也不能化约为个人成长的故事。1972年,他被赶出苏联的时候,给勃列日涅夫写过一封信,预言自己会再回到圣彼得堡:诗人总会返乡,无论是写



文章回忆，还是亲自回来。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但一切已经晚了。圣彼得堡对布罗茨基来说只是一座空城。一座被过往岁月榨干了汁液的果实。他只能在想象中和死去的人一起生活、对话，然后离开这里。

FILM 影像

Following No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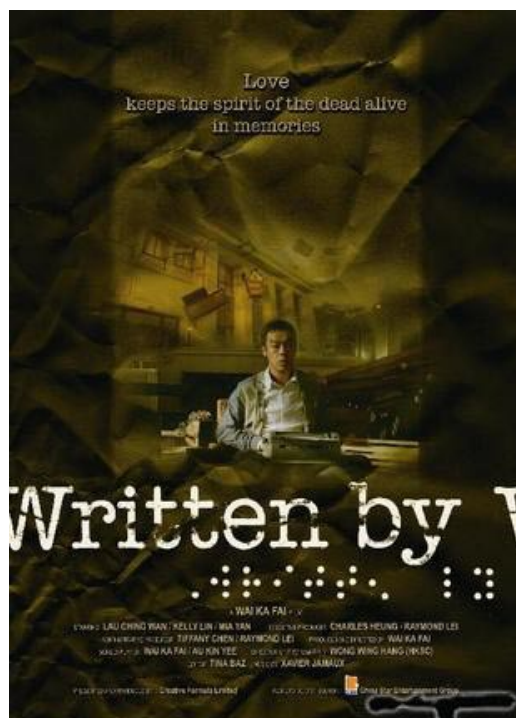
观察员 言一（成都，richard7briner@gmail.com）

1. Inception as Meta-film

虽说早在2010年7月便看到《Inception》（《盗梦空间》）的片花而对此片颇有兴趣，但彼时之兴趣却是在于Leo和梦境，导演Nolan反在其次。直至《Inception》在国内公映，被奉为高智商神作，我对此评价私下有着极度的怀疑。如今等到下载放出，阅片之后，竟是印证了自己的直觉。

在我看来，Nolan的剧本显然是被过誉了。从所谓的真实世界到Limbo空间，每一层的梦境之间不过是一种简单的递推关系——时间的流逝被放大，进入该层梦境的难度递增（需要药物辅助），以及（相应的）从梦境中醒来的难度递增。就其结构而言，不过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俄罗斯套娃而已。换句话说，其空间基本结构是线性的。相比之下，韦家辉执笔的《再生号》在剧本结构上要精致和复杂上许多：在《再生号》的剧本里，我们所遭遇的首先是两个平行的世界——Melody的父亲遭遇车祸死去，而她决定用写小说的方式来缓解自己，母亲和弟弟对于父亲离去的思念。然而在小说的构架上，Melody却是选择了一个或许可称得上对位的方式。也即，在她的小说里，死去的并非是刘青云所饰演的父亲，而是自己，母亲和弟弟。于是，两个相互平行却又耦合的空间就此出现在我们眼前。可是，韦生的妙笔远不限于此：小说里的父亲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写小说）来缅怀自己的家人。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小说里的小说。乍看上去，这似乎也是一种简单的嵌套。可是，只需稍加想象就能明白这看似简单的嵌套其实意味着无数种细节上的对位和映射——父亲所写的（子）小说将反过来影响女儿的（母体）小说——但归根结底又是出自女儿一人手笔。从而，父亲的小说与女儿的小说以一种复调的方式同时发声，互为映射，让人一不小心就会迷失其间。有趣的是《Inception》当中，Ellen Page用两面镜子映射出长廊这一场景，恰恰是对韦生剧本结构中诸多对位映射的绝佳呈现。同样精彩的也还有今敏的《未麻的部屋》，里面快速剪切所形成的剧情之不断反转，无疑是对观影者脑力的巨大考验。

不可否认的是，在Nolan的基本设定中，并非完全没有对位的机会。否则，Leo（Cobb）在介绍的时候，不会刻意的区分梦主（dreamer）和其他梦的参与者。遗憾的是，Nolan似乎并没有就此进一步发挥，譬如一旦经由不同的梦主潜入更深一层的梦境会对之前的递推规则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改变。从而，Nolan对于梦主，伪装者，药剂师，建筑师の設定更接近于所谓Heist/Caper film的结构。可若从Heist film的角度来看整部电影，建筑师在其中几乎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而Leo一开始提出的更换建筑师之理由更是多少有些莫名：一来，地毯的问题，通常更多的是interior designer在处理吧，二来，许多人的梦境都是超现实的，而且只有等醒来之后才能发现其中的荒谬。像地毯材质这种细节几乎不可能成为让人醒来或是做出判断的触发点。（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是斋藤君是受过训练。）



以上对 Nolan 的诸多挑剔，并非意在否定《Inception》这部影片本身，而是想要指出：Nolan 的真正狡诈或是精明之处恰恰在于他成功地引爆了各种媒体上对于结局，对于梦境真伪的铺天盖地的分析与讨论。正是诸多的激烈讨论，充分证明 Nolan 已然通过电影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Inception。也即，《Inception》并不仅仅是一部展示如何植入 idea 的“高智商科幻”电影，而根本就是 inception 这一行为本身——在看过《Inception》之后，绝大部分观众都开始去思考梦境空间的若干可能，开始思辨自身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幻。而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因为 Nolan 通过他的电影告诉你：也许，你不过是活在自己或他人的梦里——还记得 Leo 的那句台词么：a simple little idea that would change everything...that idea would grow in her mind like cancer。在我看来，那些铺天盖地的评论，甚至包括本文在内，都是 Nolan 所植入的 idea 肆意生长的结果。（或可参见《meme 机器》一书）

由是，抛开 Nolan 招牌式的颇具 film noir 特征的叙事手法和 Heist film 式的人物设定，我更倾向于将《Inception》认定为一部 neo Meta-film（meta 作为前缀词根，在古希腊语里有 with 和 self 的含义），如果 meta-film 的最初/基本定义是“关于电影的电影”的话。



2. Blurred Boundaries

如果说 Nolan 这一成功的 inception 对大多数人意味着对梦境空间分层事无巨细的分析，那么对我却是意味着一次对于 Nolan 过往作品的追溯和梳理。正是在这样的追溯和梳理中，Nolan 作品中潜藏着的某些特质开始浮现。

从《Following》到《Memento》到《The Prestige》再到《Inception》，在 Nolan 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闪回中缓慢铺展开来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事件的前世今生，更重要是对某个念头（idea）的无法确认。尽管 Nolan 或许在影片中已经通过种种细节暗示了自己的倾向，我们终究却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柯布（《Following》）是否存在，Lenny（《Memento》）自身的记忆是否可信，双生子是否就是 Borden（《The Prestige》）的终极秘密，以及 Cobb（《Inception》）最终回到的是否就是真实世界。显然，情节和叙事从来都不是 Nolan 的重点所在。相比之下，他似乎更沉迷于在故事中去挑战观众的某个惯常理念（idea）。于是，我们才会看到前述几部电影中的二元对立，在《The Dark Knight》这部典型的商业片里，转化为对正与邪，光明与黑暗之间灰色地带的呈现，才会在不知不觉间为小丑一角的魅力所倾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Nolan 和今敏一样，都是一生只拍一部电影的导演。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某种边界被消弥，在变得模糊，都有某种可被称为 humanity 的东西被挑战，甚至被颠覆。以至于，当以他们的作品作为触发点，我们很难不去质疑过往生活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很难不去想起弗洛伊德的论著与马克思的论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就像，我很难不从 modernity 的视角去切入 Nolan 作品中所呈现的种种挑战。

3. Symptoms of Modernity

在 Nolan 的作品中，对于现代性之症候（Symptoms of Modernity）的呈现，可谓俯首皆是，而其中最

为有趣的莫过于《Following》和《The Prestige》两部。

我开始尾随别人。起初并没有任何固定的目标。我只是随机地找一个人，一个不认识我的人。跟着他走。什么也不做。我只是看看他们做些什么，去到哪里。然后就回家……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在足球场的看台上四处张望，目光肆意游荡，但渐渐地，你开始注意到某个人，把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于是，这个人便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鲜活的个体。

当我听到上面这段位于《Following》开头的自述时，内心几乎是瞬间便涌起了某种雀跃：这不正是爱伦坡在短篇《The Man of the Crowd》里所描述过的场景么；而本雅明更进一步地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分析过这一文本的丰富内涵。

不难想象，若是在乡村，一个本地人是很难找到，更不用说随机挑选，一个自己不认识也不认识自己的人尾随其后的。尾随这一行为本身，在开阔的乡村空间，往往难以遁形。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尾随只



可能发生在人潮涌动的现代大都市。城市和拥挤成为某种现代的象征（芒福德）。而作为现代性之症候的都市人之间的淡漠与距离感则正是尾随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坚实基础。对此，在本雅明之外，恩格斯和西美尔都有过相应的描述和分析。

不曾想到的是，仅仅在十分钟之后，《Following》中的场景便又一次更为直接地指向了本雅明。当比尔第一次和柯布一同入室行窃时，柯布根据房间内的空间布局和种种物件，滔滔不绝且十分具有说服力地判断出房间主人的一些基本情况和个人特征。这使得比尔几乎呆若木鸡。对美剧十分熟悉的朋友或许会就此联想起《犯罪心理》中的 profiling，但早在 1935 年，本雅明就曾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中写道：

The detective story appeared, which investigated these traces the philosophy of furniture, as much as his detective stories, shows Poe to have been the first physiognomist of the interior. The criminals of the first detective novels were neither gentlemen nor apaches, but middle-class private citizens.

不难看出，本雅明一早便从对爱伦坡小说的阅读中挖掘出都市犯罪的“trace”（线索，痕迹）常常存留于室内的空间布局和物件之上（若在乡村，则不可能如此集中地存留于室内）。而在很大程度上，侦探小说

的兴起亦与都市的兴起息息相关——都市即为侦探小说的兴起提供了足够的现实素材，亦为小说本身提供了足够庞大的读者群。值得一提的是，Nolan 的电影常常被归入 neo film noir 的范畴，如果回头看好莱坞 film noir 之起源的话，亦和上世纪 40 年代的 hardboiled（硬汉）侦探小说颇有关联。

紧接着，柯布在电影中又进一步给出一个论断：Everybody has a box. The things in that may not be expensive, but more personal。在这里，盒子中的物件已经不仅仅是足以揭示拥有者个人特征的线索（trace），更是内涵有（embody）某段私人回忆的物件，因其足以触发对记忆，对时光寻回（trace back）而弥足珍贵。在这里，普鲁斯特和本雅明的身影又一次闪现。我也禁不住更加好奇 Nolan 是否熟读爱伦坡或是本雅明，而非是否知晓今敏的作品。

至于《The Prestige》中两位魔术师之间的巅峰对决，在我看来就像是对上世纪初科技进步与传统手艺之间尖锐矛盾的某种隐喻。Nolan 将特斯拉（Tesla）和爱迪生的纷争加以渲染放入电影之中的做法，仿佛是对上述隐喻的暗示——相比之下，特斯拉才是手工作坊模式下的天才发明家，而爱迪生更多的是一个科技行业的成功商人。尽管电影情节几次反转起伏，作为轴心的却一直都是那个执着的疑问：究竟对方的魔术是源自传统的技巧还是吸收了最新科技的后台设施。正是在这一执着的追问下，两个人事实上分别各自走向传统和科技两条不同的道路。每一条路都代价非凡，尽管或许 Nolan 在片中更倾向于传统一边。

除此之外，Nolan 更借着片中的台词点出了魔术本身的悖论：台下的观众其实知道魔术的虚假，但他们却宁愿去相信 magic 的存在。他们来到剧场，期待的不是 magic，而是被欺骗。如果把这一台词略作延伸，那么我们会发现它所表达的内涵与鲍德里亚曾经的论断并无二致：人们之所以修建迪斯尼，只是为了通过创建一个幻象来跟自己确认当下生活的真实；而人们之所以渴望旅行，也许不过是为了确认“家”的存在。

Epilogue

至此，那潜藏于 Nolan 诸多作品中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已然现出其清晰的身影。承载这种不确定性的种种二元对立则成为了现代性的具象化表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现代性之特质的话，现在的我大约会选择“blurred”；而 Nolan 所一直在做的，不过是在华丽叙事与精彩情节的掩护下悄悄潜入我们的无意识深处，植入那被称为 uncertainty 的陀螺，以借此营造出一个又一个作为中间地带（灰色）的梦幻空间。

图 1 为《再生号》海报；

图 2 为《Inception》剧照；

图 3 为《Following》剧照。

TRANSLATION 译介

北京的施特劳斯旋风

——中国学者对西方哲人的怪异口味

作者：马克·里拉

译者：江绪林（上海，jiangxulin@gmail.com）



几年前，当我还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候，我首次招收了几个中国研究生——他们从北京来，非常认真。他们来到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希望洞察列奥·施特劳斯的幽灵，后者是一个犹太德裔的政治哲学家，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习惯于对教授们保持一种缄默的敬顺姿态，所以很难搞清楚这些年轻人在芝加哥或施特劳斯处到底想寻求些什么。他们修读课程，勤奋学习，却不事交游。他们身处海德公园，却不属于它的一部分。

分。

在他们学习的第一年结束之际，我找了他们中的一位到我的办公室以便提供一些建议。这位青年人显然极具思想而又诚挚认真，而且他在北京的知识圈中已经极为知名——这因为他在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著和译作。但在刚选修的我的一门课程中，他却未能通过口头或书面英语很好地陈述自己的思想，这使得我们都有点沮丧。我询问他的暑期计划，然后谈到英语进深课程，并建议他看看这类课程。“为什么？”他问。我感到有点不自在，就直陈事实：精通英语将有助于他与外国学者沟通，也有助于他在本国发展自己的学术事业。他略带优雅地笑了，回答说：“我不太这么想”。

我完全困惑了，问他打算做什么。“我打算学语言。不过不是英语，而是拉丁语。”这回轮到我问为什么了。“我认为学习拉丁语也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希腊语。罗马人建立了一个跨越许多世纪的帝国。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他说。当他离去的时候，很明显的是：被打发走的是我而不是他。

最近，当我从为期一个月的中国演讲和访问之行返来的时候，上述那番对话重现心头。我早就听说施特劳斯在中国很流行，正如魏玛共和国的反自由主义和反闪主义的法理学家卡尔·施密特也很流行一样（后者令我很惊讶）。《纽约客》曾刊出一篇文章谈及“新生代的新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对施特劳斯的兴趣是某种令人不安的发展。然而，尤其在所交往的许多中国年轻人身上，我发现的是某种有趣得多也重要得多的东西。施特劳斯和施密特处在智识争论的中心，所有的学人都读施特劳斯和施密特，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正如有次散步时一位上海的自由派记者告诉我，“如果你不能就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思想谈点什么，这里就没有人把你当回事。”对施特劳斯的这种兴趣与十九世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对危机的回应——（当下中国存在）一种广泛共享的信念：中国历史持续千年的延续性已然断裂，所有的一切（政治的和智识的）都等待着重新建构。

在中国的对话让我回忆起八十年代中期在共产主义波兰我曾有过的政治讨论，那时刚经历了政治变动而波兰团结工会正处于最低潮。让我吃惊的是，那时候我所遇到的人们——学者、记者、艺术家、作家——都急于讨论柏拉图和黑格尔而不是当前的事态，并且这样做也并非要逃避现实。对他们来说，经典作品恰恰是黑暗时代所要求之物。让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一份用糟糕的油蜡纸印制的小小的地下杂志的出版者，他将所有的一切都关联到柏拉图的对话录。当后共产主义的波兰无法满足他的高预期时，他变成了右翼的卡钦斯基政府的部长，把他的家乡克拉科夫当成雅典，而把波兰首都华沙看成了（柏拉图所冒险的）叙拉古。

我不记得我的波兰朋友那时候是否阅读施密特，但在重新探究处在共产主义大学体系限制之外的政治的、哲学的传统时，他们确以施特劳斯为向导。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追寻着施特劳斯自己的足迹。面对着他所看到的“西方的危机”（二战前表现为西方世界对纳粹主义的软弱回应，战后则表现为对共产主义的

软弱)，施特拉斯开始致力于恢复和重述处在西方政治传统核心的那些原初问题。他是这样做的：引领他的学生和读者沿时间次序有条不紊地回溯，从尼采回到霍布斯，然后再到中世纪的犹太和伊斯兰政治哲学（他避开了基督教），并且最终回溯到柏拉图、色诺芬、阿里斯托芬和修昔底德。

面对着现实中既定的社会主义所带来的贫困、无能和不再铁板一块的暴政，我所认识的许多波兰人开始了与施特劳斯的智识之旅。现在轮到那些中国的年轻人了，他们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垮台，却看到它变形为某种形式的独裁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的反应是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

使得这些中国青年男女与我的波兰朋友们区别开来的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将自己描述为“自由主义者”。（不仅仅在东欧、而且在世界各地）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流行于九十年代的智识上的自由主义已经终结了——这种终结由政治上的伊斯兰主义以及西方的回应促成，也由全球化的力量促成。全球化带给我们一种“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人们到处都将它与不受约束的市场、劳动剥削、环境退化和行政腐败连在一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去世后大约十五年之间卷入了一场有关现代化的不同路径的激烈论争，并且认真对待人权。这一时期在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时达到顶峰。但是，几年后，当党的口号变成“致富光荣”时，中国人开始追逐物质荣耀，而知识分子则背离了自由主义政治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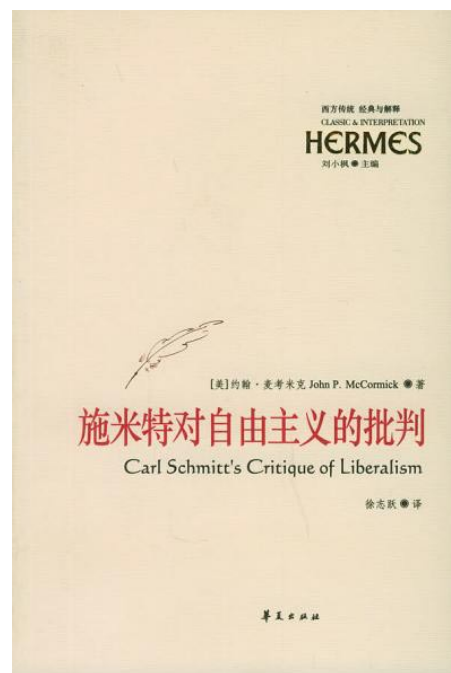
年轻一代现在觉得，自由主义思想不能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现实生活，也不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一个理想模型。举例来说，不管政治倾向如何，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更强而不是更弱的政府：一个遵循法治、可预测、能控制地方腐败、能执行长期计划的政府。他们的分歧好像都在于这样一些问题：这个强政府应该如何处置经济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如何行使这种新获得的强权。类似地，他们对于中国有权捍卫其国家利益有着完全的共识，有分歧的仅仅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轮到我谈美国政治了，当我试图解释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的目标是“不让政府骑在人们背上”的时候，我遇到的是茫然的目光和有点讽刺意味的微笑。

说说施密特。迄今四十年来，这个曾经的纳粹共谋者所写的难以捉摸的一些小书吸引了西方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心肠太软难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经验论，并且着迷于“一切始于神秘主义而止于政治”（tout commence en mystique et tout finit en politique）的观念（这不是说他们读过夏尔·佩吉的作品）。不过，在中国，对施密特思想的兴趣则要严肃得多，也更情有可原。

毫无疑问，施密特是二十世纪最具智识挑战性的反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最深刻的拒斥是一种人类学论点。古典自由主义设定了自足个体的自律或自主，认为冲突源自有缺陷的社会和制度安排；只要改进既定的制度安排，和平、繁荣、学识和改良将接踵而至。施密特则预设了冲突的优先性：人是这种意义上的政治的动物，即他的最根本特征是一种区别敌我的能力。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社会具有多元的、半自治的领域；施密特则肯定社会整体的优先性（他的理想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并认为经济或文化或宗教的自治是一种危险的虚构。（“政治就是整体，因此我们知道，关于某事是否是非政治的任何决断都是政治决断。”）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主权是自然授予给个体的一种铸币，当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建立合法的政治机构时就是在兑现这种货币；施密特则认为主权是一个领袖、一个阶级或民族的独断的自我奠基行为的结果，在这种奠基行为中这个领袖或阶级或民族径直（如神）一般宣告“要有…”。古典自由主义甚少谈及战争和国际事务，给人的印象就是：只要人权得到尊重，市场维系着自由，一个道德上普遍而和平的世界秩序将呈现。对于施密特而言，这恰恰是自由主义最大的也最具揭示意义的理智上的不负责任：当你对战争无话可说的时

候，对政治也就无话可说了。施密特说：“绝对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有的只是对政治的自由主义批评。”

由于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步伐和特点存在着广泛的不满，以及对运作中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感知，施密特的这些思想就不仅仅是睿智的，它简直就是先知性的。对于左派而言，施密特无须诉诸马克思



主义就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和政治的区分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为什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忽略了那些对政治生活中核心的现象。他的主权思想（即主权是由命令建立的并且为隐藏的意识形态所支持的观点）也帮助左派理解了自由市场观念在当下对人们具有的奇怪的影响力。这一主权思想也给左派以希望：某种事情——灾难？政变？革命？——或许能将国家重新建立于某种不同于儒家的、毛泽东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在这里神秘主义开始参与进来。）

更具保守倾向的学者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左派对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其导致的社会失范的批判，不过他们主要关心维系社会“和谐”，并不幻想中国经历另一次革命性的转型（对他们那是一场梦魇）。对历史的解读使得他们确信中国面对的持续挑战一直是维护领土完整、维系社会和平以及捍卫国家利益。今天因为全球市场的力量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理想化了个人权利、社会多元主义和国际法），这些挑战变得更剧烈了。像施密特一样，他们不能确定：自由主义思想到底是一个极端幼稚的、根本不能理解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的观念呢还是一个改变着世界的观念，不过这种改变是以对社会和国际秩序有害的方式进行的。这些学者尤其对施密特战后具有预见性的著作感兴趣：全球化如强化了而不是消减了国际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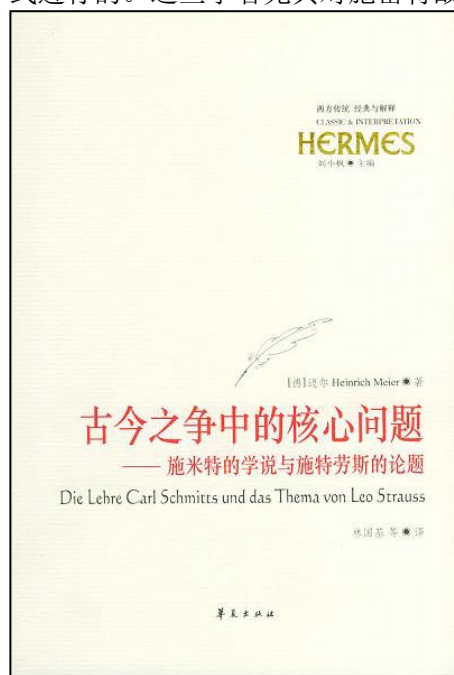
（1950年）；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有效回应，恐怖主义将扩散（1963年）。施密特的结论是：考虑到政治的对抗本质，一个由少数强权主宰的地缘政治体系将对大家都有好处。这种思想自然符合我所遇到的许多中国青年人的口味。

施密特的政治教义是一种野蛮的现代国家主义，而这在中国造成了问题。虽然作为一个法学家施密特对宪政和法治论述甚多，但在他的思想中从未承认对国家权威的自然限制，也从未认为国家具有除了维系自身和胜过敌手之外的目标。开始于孔子的中国政治思想传统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国家主义的，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东西：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等级制系统，在其中每个人都有其位置并通过清楚的义务与别人连结在一起。这一系统也包括统治者，而统治者之统治被认为是一种服侍。在这种国家的运作中居于中心的是“君子”（或有些孔子作品中的“士”），即具有品格和良知的男性，受过教养来辅佐君王，致力于使君王变得更好——更理性，更关心民众的利益。虽然碰到的中国学生很显然在通过不断地诉诸施密特来欺哄他们的老师和我，事情的真相仍然是：他们想要一个善好的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社会。

是一个强大的社会。

再回到施特劳斯。考虑到其追随者在炮制最新的伊拉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过去十年中施特劳斯思想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是他所说的“绅士”观念。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施特劳斯在哲学家和体现了公民美德和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实践者之间做出了区分。施特劳斯教导说，虽然认识什么构成善好社会需要哲学，但促成和维系善好社会则要求绅士。贵族制承认这种需要，而民主制则不承认：所以在民主社会中绅士的教育很困难，可能需要秘密进行。施特劳斯死后，这种关于绅士的观念为施特劳斯圈子大大发挥。而当年轻的施特劳斯主义者成为开始于里根政府的共和派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一部分时，他们中许多人开始自视为一个被照亮的阶层之成员，将指导美国穿过“西方的危机”。（这段插曲还有待于作家去描述）。在这种意义上，施特劳斯主义与伊拉克战争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联。

不过对于我所遇到的许多中国青年人来说，圣人与政治家之间的区分以及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的思想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们早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使得施特劳斯格外有吸引力的，除了他对西方政治理论的精妙论述外，也在于这一点：施特劳斯使得这个理想在哲学上也很可尊敬，而不必诉诸于儒家思想或宗教或中国历史。施特劳斯在他们的古老传统和我们的传统中提供了一个桥梁。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我所遇到的人中没有谁谈及后共产主义的中国。但学者们确实公开谈及需要一个新的绅士阶层来指导中国的事务，来加强国家——通过使它更明智和更公正。没有人看起来急于加入党组织，虽然他们说，党组织甚至吸纳哪怕最独立的思想家。就目前而论，他们看起来满足于学习古典语言，获取



博士学位，谋求教职，最终希望产生哲学家和绅士。他们并不着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原文: **Reading Strauss in Beijing**

详见: <http://www.tnr.com/article/magazine/79747/reading-leo-strauss-in-beijing-china-marx>

原文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刊出

作者: 马克·里拉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课教授

图 1 为马克·里拉教授

鸣谢: 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请来信告知。